



*Maozedong  
Tuijin Makesizhuyi Dazhonghua de  
Lishigongxian Yanjiu*

# 毛泽东

##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历史贡献研究

毛玉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项目

#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历史贡献研究

毛玉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研究/  
毛玉美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07-4204-5

I. ①毛…

II. ①毛…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54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226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网站编辑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继承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大胆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形成通俗易懂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和理论思考,总结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途径、做法,对于宣传普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就是笔者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研究的一个尝试。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最近几年相继出现,专著还很少见到。从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看,学者们主

要从宏观方面阐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思考、理论贡献，侧重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通俗化、普及化。这些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通俗化、普及化本应是大众化的首要之义。但笔者认为，毛泽东所倡导、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包括通俗化、普及化，而且还包括群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目的是群众化，只有做到了群众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中国人民大众所掌握，变为中国人民大众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精神武器，真正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面貌，才能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所以，通俗化、普及化与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向互动的过程，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要看到他在这两个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同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是多方面的，是立体的，包括大众化的理论、大众化的实践，大众化的内容、大众化的形式，大众化的路径、大众化的方法。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等多种元素，“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被中国人民大众所接受的“中国的东西”。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构建了本书的结构体系。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总论，主要阐述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所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分论，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大众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语言形式的通俗化、教育对象的普及化等四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实际、民族特色、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结合，运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民群众又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精神武器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力量的。第六章是前面各章的总结，概括论述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本书按照总一分一总的逻辑思路加以展开，试图根据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的原则,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分析和总结,力求对这一课题进行较为全面、较为系统、较为深刻的研究,做到观点正确、内容全面、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把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理论阐述与实践效果相结合,力求做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以增强本书的可读性。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多视野加以探讨的课题。本书所选取的内容和研究角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期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有所借鉴,有所推进。

#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者、实践者·····	(1)
第一节 毛泽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新境界 ·····	(1)
第二节 毛泽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	(27)
第二章 从“外来哲学”到“中国气派”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 ·····	(45)
第一节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	(46)
第二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分析研究中国 的问题 ·····	(62)
第三节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	(76)
第三章 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	(92)
第一节 分清革命的敌我友 ·····	(92)
第二节 解答人民群众的困惑·····	(102)
第三节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120)
第四节 建立人民群众的新文化·····	(127)
第四章 深入浅出，喜闻乐见 ——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	(140)
第一节 以高度概括、生动活泼的语言阐明中国革命的 理论·····	(140)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研究**

第二节	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阐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170)
<b>第五章</b>	<b>大众为本,教育为先</b>	
	——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化·····	(186)
第一节	对普通工农群众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187)
第二节	对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208)
第三节	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218)
第四节	宣传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228)
<b>第六章</b>	<b>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b> ·····	(246)
第一节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246)
第二节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258)
<b>主要参考文献</b>	·····	(275)
<b>后    记</b>	·····	(278)



# 第一章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者、实践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不要大众化?能不能大众化?怎样实现大众化?大众化的本质、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并解决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泽东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总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反思和批判教条主义错误危害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者、实践者,他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而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法。

## 第一节 毛泽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创新成果由抽象到具体、由精深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并成为变革实践的思想武器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日益严重的教条化、经验化的问题,号召构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新鲜活泼的大众语

言形式,创造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大众文化形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所认识、所掌握,并深刻地嵌入到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sup>①</sup>,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实现了从主权独立到经济建设历史主题的成功嬗变。所以,毛泽东不但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

###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马克思”及其学说就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来到中国的。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人胡贻谷。<sup>②</sup> 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讲解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这是李提摩太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的。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和主要观点又出现在来华传教士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上,从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欧洲游荡了中国。在此后的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尽管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研究,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有传播开来并形成思想运动。

马克思主义是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民主共和制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才形成新的社会需求。中国先进分子从对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成为空招牌的失望,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② 参见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怀疑，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所走过的道路而进行新的选择。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正在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看到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新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所接受。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形成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并很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一切，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需求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的艰难历程作了这样的总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民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①</sup>

但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其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的材料作根据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人的思想武器，运用它来解决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向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人民大众，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一个认识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实践过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等,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推进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理论上讲,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而且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和民众的力量相结合。先进的中国人是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献身精神和强大力量以及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认识到,“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sup>①</sup>。而如果只限于空谈,是成就不了任何革命事业的。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影响至大,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影响着一代人的思想变化。李大钊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他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sup>②</sup>。李大钊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思想行为也主要围绕着这一基础展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因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为民

---

<sup>①</sup> 转引自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1~712页。

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他不仅重视工人，主张积极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号召知识分子速向农村去，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强调：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陈独秀是一位具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于他在国内进步青年中享有崇高声望，他的思想转向对国内思想界影响十分重大。陈独秀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论，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指出不能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表明了他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态度。

李汉俊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参与《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积极引导刊物成为上海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李汉俊最初介绍马克思主义时侧重其社会经济和社会改造理论。他写文章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强调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是根本手段。1919年10月他提出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团结一致改造社会的思想。他说：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化“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希望。1920年初，又先后发表《改造要全部改造》、《三益主义》等文章，批评互助的改良主张，强调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李汉俊的文章深入浅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董必武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

<sup>①</sup> 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0页。

在实践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实际出发,用通俗的语言,多种形式揭露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组织了众多的团体,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即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一起,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李大钊对该会十分重视,希望其能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sup>①</sup>。毛泽东、蔡和森和一批进步青年早在五四运动前就成立了新民学会,1920年夏,毛泽东、蔡和森相继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推动新思潮的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讨论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活动方针时,毛泽东坚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以布尔什维主义为方针,他强调:“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sup>②</sup>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许多会员的思想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1920年9月,《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出版,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宗旨,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宣传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家的真实形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共产党》、《向导》、《先驱》、《妇女声》、《新时代》、《少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方针与主张。中共还创办了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

<sup>①</sup>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1页。

<sup>②</sup> 转引自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机构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参与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他写有《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还原》、《评第四国际》等大批文章，批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为唤起工人的觉醒，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启发工人觉悟。比如，1920年1月，李大钊组织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进行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陈独秀亲自到工人中去，了解罢工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出版了面向工人群众的通俗刊物《劳动音》、《劳动界》、《劳动者》等。《劳动音》周刊要求先进分子改变轻视下层民众的旧习，到实际中去，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党组织还创办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始在工人中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这些刊物还大量刊登工人来稿，诉说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工人们称这些刊物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劳动界》发行最多时，每期销售4000份，《工人周刊》则多达20000份。<sup>①</sup>

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纯学术的理论，也不是知识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实际运动相结合，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改造社会的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党很快就意识到，作为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实践活动仅仅停留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上，必须面向实践，争

---

<sup>①</sup> 参见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取群众。1922年,党在决议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由此可见,面向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头脑,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种认识在党建立初期就已经树立起来。

###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中国理论工作者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大量问世,他们有的从更深程度上系统、完整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推向深入;有的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广大的普通民众。在这一阶段,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各种团体从事文艺救亡活动,提出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更加注意文艺的大众性和创造性,发挥了动员民众抗日的的作用。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35年,李达发表了《社会学大纲》,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全新的阐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是一个重要贡献。《社会学大纲》首先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原理和规律,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探讨,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李达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理论内涵的阐述,深化了人们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给毛泽东创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巨著《矛盾论》以直接的启发。

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大纲》的另一重要内容。和一般苏联学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母体的观点不同,李达



认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它“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讲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sup>①</sup>唯物辩证法是历史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实践的、统一的观点，决定了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为加以割裂，强行分出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李达在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还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基本原理。强调未来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这一矛盾在一切社会的构造中，不论是在非敌对的社会或敌对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这一论断，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因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最高权威斯大林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20多年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阐述，实际上接受了李达的这个观点。所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世纪30年代，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成为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的典范。1934年，为适应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给广大普通群众的需要，艾思奇在认真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基础上，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1934年11月至1935年年10月，他在上海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主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了24期的“哲学讲话”，生动、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哲学讲话”汇集成书，易名为《大众哲学》出版。《大众哲学》产生于抗日烽火

<sup>①</sup> 《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之中，可谓应运而生，风靡全国。从1936年到1948年，总计发行了32版之多，“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大众哲学》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独树一帜，正如李公朴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深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日前的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sup>①</sup>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比喻，把人民大众熟悉的事物、典故与哲学理论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使抽象的哲学原理变得生动、简明，从而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如使用雷峰塔倒塌的事例来说明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用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故事来阐释现象和本质的理论；用“在劫者难逃”的俗语来形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用“钻牛角尖”一词，比喻物质及其研究的深远无限性等等。

《大众哲学》出版后不久，艾思奇又先后出版《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著作，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更深入的论述。艾思奇的著作，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除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支歌、一本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大众哲学》。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了延安。蒋介石曾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这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据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准备南迁，校方动员学生把书籍交到学校统一保管运输，结果发现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大众哲学》。革命前辈邹韬奋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sup>②</sup>毛泽东

① 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对艾思奇的作品也十分重视，1937年9月，他曾致函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sup>①</sup>可见，毛泽东表示出对艾思奇的尊重和对《大众哲学》价值的肯定。

除李达、艾思奇外，20世纪30年代，吴亮平、张如心、沈志远、陈唯实、胡绳等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如心的《辩证法学说概论》、吴亮平编译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新哲学世界观》及胡绳的一系列论文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力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大批接受或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作家、艺术家、学者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尽心尽力。他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思想。

1930年3月，左翼文学界的同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同盟。“左联”在自己的工作方针中明确规定，“确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理论”，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左联”成立伊始，文艺大众化就成为它的一个主要工作，他们建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出版了《大众文化》刊物。“左联”成立后，一大批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如社联（社会科学联盟）、剧联（戏剧家联盟）、影联（电影工作者联盟）、美联（美术家联盟）等等。为统一领导，1933年，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左翼文化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主张文艺大众化的进步文化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大众化问题：一是主张文艺必须和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适应，致力于开展一场争取文化平等、反对文化专制的斗争；二是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力图解决革命文化活动中拟想读者和实际读者不一致的状况,使文化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文艺大众化运动超出了一般的文化争论开始和具体的现实的大众抗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大众化从一种文化活动上升为抗日救国的政治性活动。1935年12月,北京文化界人士结合抗日状况,提出“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民族的生存而提出救亡的主题”,力争通过文化活动直接介入抗日斗争,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随之,一大批与民众抗日活动相关的大众化文学刊物相继创办,如《大众》、《大众文化》、《大众生活》等。1936年9月,由陈伯达等共产党文化界人士掀起新启蒙运动,反对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以要求人们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服从法西斯统治为宗旨的权威主义教育,这种新启蒙运动使得大众化运动进一步推广开来。

1936年11月22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是陕甘宁边区,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抗日文艺社团。其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等34位中共和拥护中共的文艺名人。协会明确规定它的宗旨是为抗战服务的,并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支持。毛泽东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说:“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sup>①</sup>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统治区的抗战文艺社团纷纷出现,这些抗战文艺社团创办文艺刊物,宣传抗战文化,积极提倡文艺走战斗化、大众化之路。他们提出文艺应该成为教育和动员广大民众抗日的工具,要发挥文艺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具作用,就必须做到文学的大众性。所谓文艺的大众性,就是文艺要面向民众,要让它从文艺家个人的事业中走出来成为人民大众的文艺,真正成为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动员人民的工具。对于文艺的这种大众性,可以说已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中成为共识。在1938年时,郭沫若就向文艺界发出倡议: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因而艺术大众化成为迫切之课题,必须充分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苦痛和要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要做到文艺的大众化,就不能不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形式。“旧瓶装新酒”就是当时文艺工作者倡导的形式。艾思奇认为,文艺的主要目的是要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在这样的目的面前,就必须提起旧形式的利用问题。首先是因为要能真正走进民众中间去,必须它自己也是民众的东西,也就是说它能和民众的生活习惯打成一片。旧形式,一般地说,正是民众的形式,民众的文艺生活一直到现在都是旧形式的东西,新艺术形式并没有深入民间。

总之,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围绕着文化服务方向和对象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开拓创新

毛泽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实践经验,提出并完善了马克思大众化的理论。他强调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他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本质,而且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生长点——中国的历史文化。

#### 1. 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大众化”,而不能“小众化”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理论的功能在于武装人民群众,认为理

论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变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实践性、群众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品质。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sup>①</sup>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它必须走向实践,走向群众,也就是要中国化、大众化;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又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二者的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大众化的依据。毛泽东正是从这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理论的通俗化问题。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概括性,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例外。如何使中国的人民大众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制作”与“话语重构”,使之通俗易懂,也就是传播者要用人民大众常见的、熟悉的、喜欢的,便于接受的方式解说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目的在于消除人们接受理论的障碍,增强理论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践证明,大众化离不开通俗化,通俗化促进了大众化。毛泽东深刻认识和领会了列宁关于“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的思想,坚持把普遍的真理具体化,深刻的理论通俗化,使人们看起来简洁明了,读起来亲切感人,听起来明白易懂。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进程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中，毛泽东非常讲究理论宣传艺术，注意拉近“高深的理论”、“大的道理原则”与群众的距离，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鲜活、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亲切感和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需要通俗化，而且需要民族化。通俗化离不开民族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成空洞的东西，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体现中国特色，使之在内容、语言、思维方式等方面保持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经典作家面对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时代课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运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有一个同当时当地的情况结合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各国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是由各国的国情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要有深厚的民族土壤，即必须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要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sup>①</sup>，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结合起来，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就其内容来看，也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大众化的问题。

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讲话、演讲，极力引导全党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十分鲜明地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导向，一是实践导向，二是大众导向。对于实践的导向，毛泽东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无用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对于大众的导向，强调理论必须深入群众，脱离群众的理论同样是无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大众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大众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要讲“大众化”，而不能“小众化”。他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sup>②</sup>他批评了那些口头上讲大众化而实际小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出来，没有下决心跟老百姓学，怎样实现大众化？“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sup>③</sup>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种种表现，严厉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完全不考虑宣传的对象，写文章不顾读者，做演说不顾听众，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明确强调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他自豪地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后，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一系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sup>①</sup>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可见，马克思主义必须大众化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立场。

### 2.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及本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毛泽东在其著作和讲话中没有像他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集中、那样详尽，但通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综观他关于大众化的诸多论述，就不难发现他的大众化的思想很明显地渗透、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命题。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实践论》（1937年）、《矛盾论》（1937年）、《论新阶段》（1938年）、《〈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反对党八股》（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63年）等著作和讲话中。我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和思想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变为中国的东西，变为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毛泽东认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sup>①</sup>大众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反复教育全党，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和思想武器，我们学习研究它，不是把它挂在口头上作为借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sup>②</sup>；更不是脱离中国实际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而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实际，历史文化，“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sup>③</sup>，这就是有的放矢。这样，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用中国的语言，用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发挥伟大作用的科学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特点结合起来，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真理的光芒。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内容上而且形式上都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在内容上，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的认识论、辩证法的思想，充分融合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资源，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不同国情、不同的具体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通俗化、民族化，使之更容易、更直接地被中国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在形式上，运用新鲜活泼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入人心。这一内容笔者将在第二、三、四章中详细阐述，这里不多赘述。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毛泽东对这一内涵的阐述见之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主要批评了有些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懂群众的语言，不愿了解和熟悉群众的现实生活，因而创作不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的现象，提出了什么是“大众化”。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sup>①</sup>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出了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问题。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联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农民占有人口的大多数，人民群众除了受本国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还受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复杂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的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的经验,不可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求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因此,中国人民要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为中国人民所理解、所掌握。因此,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环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将它内化为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把它变为中国化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个环节。中国人民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它变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三个环节。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这三个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有的学者把这三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称之为“知道”、“成道”与“行道”。在这相互联系三个环节中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成为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行动指南。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人民大众的关系看,要做到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民族化、现实化,还必须使这一理论能够说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①</sup>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具备对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的特点，必须具有正确反映当时中国实践的特点。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道路、革命的历史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所依靠的力量、革命的步骤以及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并以民族的语言和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方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著作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读哪些书？从哪些文章著作学起？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学习？怎样学习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引导，逐步带领党和人民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殿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员和号召。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的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sup>①</sup>他希望全党来一个学习的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对于怎样学习，学习的内容、目的和方法，毛泽东也向全党提出要求。他说，我们不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当成革命的科学习来学习。不但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深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民族进行空前的革命斗争，没有革命的理论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sup>①</sup>

1942年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比较系统地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通过对什么是真正的理论，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家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人民大众的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sup>②</sup>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是我们实践的指南。毛泽东批评了党内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认为这会阻碍理论的发展。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那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蒙昧无知的人。

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理论家？毛泽东认为这两种人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种是仅仅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没有进一步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有企图在理论上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种是对中国的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完全不能应用，也不能够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sup>①</sup>所以，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家，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又要研究中国的实际，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样，要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给党内的两种人即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在开了不同的“药方”，就是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知识分子要放下知识的架子，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工农干部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他提倡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通过对什么是真正的理论，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家的阐释和思考，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和人民怎样才能掌握这种理论，以怎样的态度学习和工作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即理论掌握于群众就被毛泽东深刻地揭示出来。

### 3. 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长点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sup>②</sup>在毛泽东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的人民大众所掌握，不但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实际”的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合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文化的结合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中国民族文化之中,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他敏锐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找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点,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资源的融合,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要想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长点。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必须要结合,而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具体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成为具体的理论,才能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多相似或相通的因素,正是这些相似或相通的因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已经过了时的与新思想新文化相对立的旧东西,而其中的不少内容在现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重要意义。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sup>①</sup>,它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又以中国人民通俗的语言和熟悉的方式表达出来,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掌握。

例如,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出和倡导,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教育动员人民大众投身于革命,实现理想人格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的时候,就明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确宣布，他们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伦理、倡道德，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作贡献为人生价值之所在的精神，提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应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像白求恩这样的外国医生，像张思德这样的普通战士，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楷模。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sup>①</sup>。他在悼念张思德时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sup>②</sup>正是像白求恩、张思德这样的普通党员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吸引着、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同时，毛泽东把传统文化的为民族为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使之不再与忠君和为封建王朝服务相联系，而是把服务、献身的对象转向社会的大多数人——人民。毛泽东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大众化的最通俗、最简明的表述。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又如,以人为本,“重民”、“爱民”、“惠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毛泽东对这一思想进行继承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相融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思想理论。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才能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学习他们的质朴本色。毛泽东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由中国知识分子最先接受的,但如果这些知识分子不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不深入到广大农民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学习和吸收他们的质朴本色和革命精神,那么,党就会失去生命力。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差别,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大众结合,向他们学习。因为他在社会实践中感到,有些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就认为,读了马克思主义本本的知识分子,只有向不识字的工人学习,吸取他们的优秀品质,才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并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善于把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用以表达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原则、原理。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等文献中非常普遍。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注入中国古代语汇使之获得时代新意义的达700余处,考其语源或出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或出自《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以及《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二十四史》、《三国志》、《资治通鉴》诸种体裁古典名著,等等。比如,引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来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引用《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引用班固《前汉》中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引用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来说明认识的全面性。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这些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给人们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第二节 毛泽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行的，二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进程。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同时推进，各具特色

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看，大众化是伴随着中国化进行的，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化和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体过程，二者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又各有侧重、各有内涵，各具特色；既不是等同的，又不能相互取代。中国化是核心和主题，是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大众化是结果和目的，是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试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提出、问题的切入点、理论成果的形成等方面来探讨他对“两化”的认识。

1.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提出看“两化”的任务与使命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在会上作了长达6万多字的报告——《论新阶段》，在其中“学习”的标题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①</sup>这段话的针对性非常明确，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入绝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无不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此，党在幼年时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理解，再加之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因而在现实斗争中曾经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不顾中国的革命的特点，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别国的革命经验，差点葬送了中国的革命。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在上述引文中，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连用了“三个必须”，表现出他要带领全党打破教条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简言之，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二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sup>①</sup>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党在学风、党风、文风上存在的问题，更加明确地作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论断，并把它上升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的高度来认识。建国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和谈话中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中国的具体情况、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堪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从不迷信经典作家的本本和别国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用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加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进行革命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本章第一节中，笔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已作过阐述。毛泽东第一次讲到“大众化”是在1942年2月延安整风期间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707页。

中,随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大众化”,并阐述了人民大众的概念。他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从毛泽东提出“大众化”的语境和目的来看,“大众化”主要针对党内存在文风上存在的党八股现象和文艺工作者在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服务方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希望全党同志认真分析各自的情况,好好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的东西跟周围的人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针对文艺工作者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sup>①</sup>。希望他们要深入革命实际,了解群众,要学会人民大众的语言、熟知人民大众的生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但随着整风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仅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而且也成为全体党员干部、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工作的指针和方法。这一点,在中共中央的两个文件里已作过明确的规定。1943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各地党收到这一篇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sup>①</sup>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作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中央总学委对此已有明确指示。”<sup>②</sup>

通过延安的整风学习，延安文艺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都呈现出崭新的景象。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特别称赞了秧歌剧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因为他没有反映边区的经济、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慢慢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有了广大的群众欢迎。”<sup>③</sup>在延安除了掀起了大众化的秧歌运动以外，还陆续出现了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好节目、好作品。如陕北民歌《东方红》、歌剧《白毛女》，文学作品《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小二黑结婚》等，木刻画《减租》、《群英会》、《小八路》等，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可见，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八股的文风逐步得以克服，生动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开始形成，同时，在这场空前的思想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早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如何克服

---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③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教条主义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障碍是脱离群众,如何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宣传动员群众,服务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使命。在毛泽东看来,二者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党八股,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理论与群众相脱离。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又是相通的,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同一过程。

### 2. 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的切入点看“两化”的主要侧重点

中国化的切入点是中国实际、中国实践。毛泽东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和别国的经验出发,而是直面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对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简单地传播、移植、结合,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创造、重新检验和证明。然后,再用通过检验、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了本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提出要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强调实践是一切认识的现实基础。“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



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sup>①</sup>因此，任何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实践又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实践。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切入点是人民大众。他要求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做人民大众的学生，要有满腔的热忱，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研究他们的现状，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做人民大众的老师，对他们进行宣传、动员、引导、教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党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与革命斗争经验，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历史文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及历史任务等等。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切入点不同，因而它们分别有不同的主体和客体。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客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包括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主要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党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学生、知识分子等，客体是人民大众。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不同。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化的切入点中国实际和中国实践与大众化的切入点人民大众又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实际本身就包含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实际状况，而中国实践的主体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中国化过程包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含了大众化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理论和实践两层面的创新,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主要侧重于群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两个过程、两种使命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核心,是母体,是大众化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蓓蕾,是中国化的目的和结果。

### 3.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看“两化”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和前提,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基本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在实践方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理论方面,是产生了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两方面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实践的验证。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对此,刘少奇曾经作过这样的阐述: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

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sup>①</sup>

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体系之所以完全是中国的,是因为它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特殊的复杂的问题。它之所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时候,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许多中国实际问题也通过深刻的理论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化了。据笔者粗略统计,《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入毛泽东的文章著作159篇,《毛泽东文集》第1~8卷,收入的是《毛泽东选集》1~4卷以外的重要文稿,共803篇。毛泽东这962篇重要文稿,包括他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著作、讲话、谈话、部分重要的书信、电文以及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文件等。这些文献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特点,总结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光辉典范。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一

---

<sup>①</sup>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般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78年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sup>①</sup>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文本上基础和理论前提,而且在实践上也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上世纪40年代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发动下,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同步进行,全党在学习、宣传、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全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因历史任务的不同,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看，毛泽东首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特性进行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其次，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全党范围内的“大众化”，同时，通过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使马克思主义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当然，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中遇到重大的曲折。

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尝试及在全党范围内的展开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建国前

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阐述了大众化的概念、大众化的本质、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与方法。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全党范围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撰写出大量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前提。

第二，注重对全党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如，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案中，特别强调

了党内教育问题和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sup>①</sup>并且规定了教育党内的材料和方法，在他列举的10个学习材料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是其中之一。教育的方法列了18种。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提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意义，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及纠正的路线等。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把文化建设放到了首位，提出了文化教育不能与政治脱离，与群众脱离，与劳动脱离的原则。苏区文化除进行文化扫盲外，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如演戏、看画报、唱民歌、讲故事等形式，寓政治教育于娱乐之中，从而达到提高苏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激发其革命热情的目的。延安时期，中央创办了各种机构、报刊、杂志等，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充分运用民间文化的各种形式。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突出的成果是对全党进行了普遍的、深刻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理论和学习历史、了解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推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由全党辐射到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第三，这一时期，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主要是在革命根据地，在敌占区，由于反动当局严厉的查禁和镇压，很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和传播工作。即使在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在驻延安之前，因紧张、激烈、流动性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中共也很难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工作。当时，对干部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的培训工作，主要是派往莫斯科留学进行的，能到莫斯科受训的人毕竟是少数，再加上中共广大党员多数出身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甚至是文盲，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很少见。因此，对中共广大党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虽然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稳定的一个短时期内做了一些，但总的来说，一直是薄弱的。1937年中共中央驻延安后，中共在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于是，对广大的党员干部进行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和传播工作，有了良好的条件。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在党内进行有计划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教育工作，特别是由中央自上而下地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以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这一全党的学习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

第四，这一时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推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这一特点，从中共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规定了干部（学生在内）必读的22个文件。这22个文件是：

- (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 (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 (3)康生的两次报告；
- (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
- (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
- (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17日)；
- (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
- (8)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21日)；
- (9)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
- (10)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
- (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 (12) 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
- (13) 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 (14)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 (15) 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 (16)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
- (17) 宣传指南小册子；
-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 (19) 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
- (20) 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
- (21) 斯大林论平均主义；
- (22) 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这 22 个学习文件，大多数是毛泽东所写和他领导下编写编辑的材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件 16 个，占总数的 72.7%。可见，毛泽东在这次对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理论成果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这种学习安排，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理论，符合当时党员干部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因为，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并以中国民族的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它们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所接受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全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之作。

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展开阶段：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展开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建国之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新时期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还不能完全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状况。如:结合三年整风整党运动、没收官僚资本和三大改造工作,在党内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民文化扫盲过程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在这 17 年中,广大理论工作者在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陆续进行,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根据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1951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能首先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批判,领导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活动。这样就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同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总结报告时,系统地论述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群众的问题。他说:“用什么东西来教育人民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任务。”<sup>①</sup>

第二,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党和政府组织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工农群众、

---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2 页。

各界民主人士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理论工作者在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倡导全党要学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社会主义阶段的新问题。他说:“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按照辩证法办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sup>①</sup>真理与谬误,美与丑,善与恶,香花与毒草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这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sup>②</sup>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左”的失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过激教条主义的做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比如,随着1958年经济的“大跃进”,文化上也出现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挫折,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纠正的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与“大跃进”相伴而出现的全民学哲学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逐渐变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运动。至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一度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控制和利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毛泽东思想“顶峰论”，在这一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逐渐演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推崇和对毛主席语录的机械背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整得面目全非。“文化大革命”后半期又提出了开门办学、创建农民学习班、办好政治夜校、发挥电影和样板戏的作用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法，但是，路线方针“左”的错误，其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遭遇重大挫折。

同时，毛泽东还对一些极左宣传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比如，1968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中，指出：当前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做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sup>①</sup>又如，1968年9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

---

<sup>①</sup>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8～1559页。

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再如，1970年4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了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文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6页。

## 第二章 从“外来哲学”到“中国气派”

###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经典作家面对的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时代课题,反映的是欧洲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本内容是有时代特点的,其形式也具有民族特色。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有一个同当时当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这种“外来文化”怎样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呢?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实现哲学的变革,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融入到中国的国情、历史和民族文化中,以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表现出来。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了这一历史任命,他不仅从内容上把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在形式上实现了语言的通俗化、生动化,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变成被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中国的东西”。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脱离了人民大众生活的哲学理论迟早要被人民所遗忘，只有关注人民生活、面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才能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内心，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只有代表人民大众的哲学才能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成为指导人民实践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和人民性。马克思将人的实践活动置于无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多种角度，多重视阈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阐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出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如何实现这个“结合”，在方法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同时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人民认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形成与普及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众化的过程。

### 一、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如何引导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他合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俗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揭露和批判了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理论和实际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倡导以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一个严峻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变革中国社会，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遭遇到了教条主义的困扰。正如胡乔木在1980年所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但具体到20世纪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与实际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多种困难，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对待外来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本本”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的。

二是如何对待来自斯大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指挥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然而，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不能不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三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这里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是一组数据。有研究者统计，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122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738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作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另一个是王明上台。王明上台及其长达四年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推行，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操纵和支持下实现的。为了扶持王明上台，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自来华，

改组中共中央,促进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7岁的王明选举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实际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从上述两个事例可以见得,苏共及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机构及重大决策的巨大影响力。

三是如何对待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中,由于我们党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较为贫乏、较为肤浅,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的具体实际和革命的具体实践不够了解,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这三个方面的困难有时是分开的,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带来重重困扰。这些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迷信,更主要是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迷信。后一种迷信不只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而且是以体制和权力作保障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不仅要打破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思想束缚,还要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

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首先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找到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国情实际和历史经验进行哲学的总结和思考,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其中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历来重视结合中国实际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要纠正主观主义,“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



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sup>①</sup>。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思想路径,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批评了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唯书”、“唯上”的错误想法,他们以为只要遵守六大的“本本”,就保障了永久的胜利。这些人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的路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②</sup>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斗争”、“中国同志”、“中国情况”,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其寓意非常深刻,他反对把中国问题交给那些根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来解决,反对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强调只有中国的同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情况才能解决好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从哲学高度总结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1937年7~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更为系统地 from 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sup>①</sup>

20世纪40年代，我们党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全党范围的意义重大的整风运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运动的宗旨是总结党二十多年来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起对待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严厉批评了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去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他向全党提出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sup>②</sup>接着，毛泽东生动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可见，毛泽东已把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学者提倡的一种“求实”的学风，即在做学问时，首先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根据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借用“实事求是”一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赋予全新的含义。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文化形式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首先，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人们通过实践去认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实事”，引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人们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其次，实事求是包含了在实践的基础上，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到实践，即由物质到精神，又由精神到物质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从“实事”中求“是”是物质变精神，以求得的“是”，去能动地改造“实事”的实践活动，是精神变物质。客观与主观，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

再次，实事求是揭示了认识运动是一个不断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辩证过程。“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而一个个事物就是一个个矛盾，从“实事”出发，就是从客观事物的矛盾出发，“求是”就是研究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所以，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事物前进的过程。

由此可见，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范畴、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本质。所谓精髓，就是集中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思维成果的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思想。它是相对于整个理论体系而

言的,是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创立和发展完善的科学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对于某一理论而言,指的是能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贯穿其始终,同时又体现这一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中最本质的东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妙,它其实是很朴实的东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国人民只要理解掌握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就好比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通灵宝玉。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 二、教育党和人民要做到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反对离开中国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初,就常常告诫全党:“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sup>①</sup>不做调查,就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1932年4月,红军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东路军主力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但在打土豪的过程中由于没做调查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一经发现后,立即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说: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能,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的、拿文明棍的、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sup>①</sup>

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何制定正确的土地纲领和土地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农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一项极其艰难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农村实际,研究农村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党内,毛泽东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他在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农村的政治、交通、商业、旧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和各种剥削方式等情况,为中共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纲领和土地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比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全面考察了寻乌的旧有土地关

---

<sup>①</sup> 《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载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系，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他在书中专门写了“卖奶子”（客籍称儿子为奶子）一节。他说：“我就是就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sup>①</sup>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他们村共有三十七家人，其中有五家卖了儿子。这五家是：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四个儿子卖掉三个；刘昌伦是佃农，三个儿子卖掉一个；刘昌纯是佃农，两个儿子卖掉一个；林芳廷是佃农，三个儿子卖掉两个；陈良有是佃农，只有一个儿子还卖掉一半。这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办法，只好把儿子卖掉，一面交租还债，一面自己吃饭。其他两人谈的也大体相仿。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户人家大概有十多户是卖过儿子的。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因此，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sup>②</sup>毛泽东还特别说明：“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这表现了毛泽东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革命是复杂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对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简单形象的表达，但真正把土改政策落到实处，既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又能协调各阶级利益关系，却是很复杂的问题，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土地政策。例如，分配土地究竟以人口为标准好，还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好？而

---

①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土地本身又有肥瘦和多少的差别。分配土地究竟以乡为单位好，还是以区或以村为单位好？非农民像游民、僧尼、道士、传教士等是否分田？地主、富农分不分田？为什么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如何限制？怎样区分大、中、小地主，如何对他们区别对待？等等。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去老老实实地做调查研究，就根本理不清楚，无法制定正确的政策，更无法去做农民的组织动员工作。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的前言中说过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回顾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又总结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给，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sup>①</sup>

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地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总是不断丰富和发展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总是不断地教育全党、人民要学会调查研究。例如，1931年4月，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提出这样两个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sup>②</sup>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要全党同志的眼光都要向着周围实际事物的

<sup>①</sup>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调查和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并认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sup>①</sup>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认为我党对客观情况的了解多属于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因此,他要求全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sup>②</sup>。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的收集材料的方法,在所列的七种方法中,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方法就是“写名人列传”,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细致入微的要求。“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sup>③</sup>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育党和人民学会调查研究，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和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根本途径，是沟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唯一“桥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中心环节。同时，毛泽东在大力宣传、倡导、推广全党的调查研究风气中，使党学会了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大批党员干部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化解和克服了党内的思想矛盾和工作矛盾，认清了国情，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克服了教条主义，打破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学会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于那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有着切肤之痛。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列举了三种主观主义的学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说，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有的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很多留学生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职干部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做研究工作的，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根据他们当时的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而不去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际，就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为此，他认为，只有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去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由此，毛泽东提出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精通它，应用它。毛泽东说：“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sup>①</sup>显然，毛泽东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其实质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 三、用民族的语言揭示中国的“实事”

要使人民大众掌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方法，关键是要弄清中国的“实事”，也就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其内容包括中国的领土、人口、民族、历史等状况，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国情特点等等。这些内容主要体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讲话中。这些著作以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把中国的国情特点展现给人民大众，引导他们以此为依据，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析研究了中国的领土、人口、民族、历史文化状况。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多民族国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第二，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

自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这一过程，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

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有几个特点：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而且还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的力量。

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从这一根本的国情出发，毛泽东进而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指明了方向。浅显的语言，揭示出深奥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从这些“实事”出发，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实践中学会了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论和方法。

第三，分析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实际。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我国当时的

基本国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我国近代工业在抗战前只有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占80%，“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又说，“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sup>①</sup>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中国的落后。指出，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以外，我们还有两个缺点：“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教育都不高。”<sup>②</sup>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情。

毛泽东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与研究的任务。他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sup>③</sup>如同研究战争规律一样,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建设的规律,而且还要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的规律。毛泽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准确而深刻,表述通俗而明了,逻辑性强而又富于哲理,把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表现出来,很容易被中国人民大众理解接受。不仅如此,他还运用生动风趣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的国情问题,将内容的通俗化与语言的艺术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例如,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喻为“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革命有回旋余地的基本国情,形象地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来表达;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用“两头小中间大”来形容,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特点及中共应采取的策略方针;把民族资产阶级比喻为我们的“冤家”,引用中国的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说明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等等。陈云曾说过:“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sup>①</sup>

## 第二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 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是使广

---

<sup>①</sup>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研究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大众化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首先，他系统地、创造性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方法。其次，引导人民大众学会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 一、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总结归纳

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如饥似渴地去涉猎哲学知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成分的，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列宁的哲学；二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哲学；三是西方的哲学，包括希腊哲学，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哲学。建国前，毛泽东有两个时期比较集中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一是 1932 年被剥夺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履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责，一边抓紧时间拼命读书，集中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他后来回忆说：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

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sup>①</sup>

毛泽东身处逆境认真读马列,也是憋着一口气,以从理论上同教条主义者分清是非。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德波林的《西方哲学史》等著作,他在随后的长征途中还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的最大的收获是研习了列宁的思想和斗争策略,这从他当时向彭德怀推荐列宁著作所写的短语可以见得。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从这些内容看,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是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去思考研究问题。

第二个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直至1947年3月18日撤离,他在延安住了十年。在这期间他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有: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苏联哲学家米丁所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斯大林著的《辩证

---

<sup>①</sup> 参见曾志《谈谈我所知道的毛泽东》,载《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即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还读了一些中国哲学著作，主要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研究提纲》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毛泽东在读这些哲学著作时，写了大量的哲学批注，他始终把读书与研究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同时，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之变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表现在很多方面，本书不可能对此进行全面论述。这里仅以他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为例，来分析说明他在研读马列主义著作时，是怎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的。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是他读到的第一本系统的辩证唯物论教材，写了近一万三千字的批语。他不仅转述、归纳了原著的思想和观点，尤其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发挥、深化了原著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原著讲到的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关系，毛泽东作了这样的归纳：“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但是，“两个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一方面，“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另一方面，“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地感觉它。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sup>①</sup>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归纳说：实践贯穿着我们认识的全过程。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过程。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毛泽东涉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批语,都融进了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

关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批语不仅归纳了原著的思想,而且以丰富的实例加以论证和发挥。他的批语既引用了中国的历史典故、古语,又具体联系到中国的实际。他认为苏轼《范增论》所说“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讲了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认为项羽所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由此毛泽东联系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认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sup>①</sup>。即是说,“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sup>②</sup>。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后来的《矛盾论》等著作中得到更严谨的科学表述,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的“独立自主”的哲学根据。

对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也写了许多批语。他说: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他还引用《南宫词纪》风趣地批道:“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

① 转引自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上有哥哥。”<sup>①</sup>这样，毛泽东用老百姓所熟知的事物和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使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亲切感和亲和力，便于人民群众认同、接受。

### 二、引导人民大众正确认识矛盾问题的精髓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我们看毛泽东是如何引导人民大众正确认识一般与个别的矛盾，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的。

1936年12月，在领导党和红军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哲学论著，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战争为着重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与个别的矛盾原理，深入论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同志如何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来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尖锐批评了党内军事上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引导人民重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掌握一般和个别的认识方法。在这本书的开篇，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相关联的概念：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

<sup>①</sup>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sup>①</sup>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如果我们只去研究一般战争、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不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对于那些迷信苏联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不懂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sup>②</sup>

在这段文字里,毛泽东强调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明确地反对只尊重苏联国内战争经验而不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反对只在列宁、斯大林的本本里找主意而不面对中国实际情况想办法。尽管他在这里主要是讨论战争问题,但锋芒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问题。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所作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他在向中国人民倡导着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矛盾的特殊性,决不能把一般的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毛泽东认为,即使中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

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也不能刻板地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不能适用现在的战争，因为现时革命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应该按照现时的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的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sup>①</sup>在这里，毛泽东以战争为例，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阐述了“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理论与实践、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同时，通过这种通俗的分析论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与方法，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展现给中国的人民大众，使他们感到哲学并不是深奥、晦涩的理论，而是指导我们革命实践的行为准则。

1937年，毛泽东在为“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时，就曾讲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课时，他引用大量的事例，分析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他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他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当讲到这里时，有的学员觉得主席讲的像自己刚刚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斗。于是，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成了大家的座右铭。毛泽东就是这样，总是用简明形象的语言，生动通俗的故事，把深奥的哲学原理讲得老少皆知，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不知不觉中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

### 三、引导人民大众从哲学高度批判教条主义

从《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巨著，我们看毛泽东是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批判教条主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源于他给“抗大”讲授哲学的提纲。1937年4月，毛泽东应邀去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毛泽东讲哲学，是非常吸引人的。讲课前，他把提纲预先发给学员。讲课时，他总是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重点突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他曾对斯诺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可以腾出时间来收集准备在抗大讲课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的基本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在讲课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完善内容，1937年7~8月，写出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此后，在各抗日根据地陆续传开。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这“两论”作了修改，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为了说明写作“两论”的缘由，毛泽东还写了较长的题解。这个题解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

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到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同志。<sup>①</sup>这两本书就是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由此可见,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从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危害的结晶,它们的问世,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实践论》的思想核心,在于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sup>②</sup>“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sup>③</sup>与之相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sup>④</sup>。在这里,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教条主义产生的认识论的根源。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进一步论述了在实践中具体认识、把握中国实际情况的方法论,这就是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处理好现实和实践中的矛盾问题,包括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矛盾关系。毛泽东的这些哲学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实践论》注解)。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一套不同于莫斯科迷信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典型代表。

#### 四、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进行批判地吸收继承，并赋予其科学的意义，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时，通过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在认识论问题上，知行关系问题曾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突出的哲学问题。从古代到现代，许多哲学家对这些论述过，并先后提出过“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难知易”、“知重行轻”、“行重知轻”等观点，对知行二者的先后、难易、轻重的关系加以讨论。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科学的回答。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过的，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也曾作过认真研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主张在行中求知，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最后还是陷入了唯心论。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各种见解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出了知行关系问题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此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



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sup>①</sup>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把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sup>②</sup>毛泽东还把知行关系,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指出,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唯心论、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总结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sup>③</sup>显然,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赋予了古老的知行关系以新的理论生命,而且,还使它具备了真正的实践品格。

在辩证法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自先秦就存在着以《老子》和《易传》为代表的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系统。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的学说主要体现在《老子》这一哲学著作中。他提出的“道”,代表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他系统地提出了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sup>④</sup>同时,又指出事物都是向着相反的方面变化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sup>⑤</sup>老子总是劝诫人们“无为”,无为才能有所为;他倡导“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④ 《老子》二章。

⑤ 《老子》五十八章。

与之争”。他还提出了以柔弱克刚强的原则：“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sup>①</sup>总之，《老子》在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并向对立面转化的普遍关系时，强调对立面中柔弱方面的决定作用，提出一套以贵柔、守雌为特征的消极辩证法思想。《易传》（是对《易经》的阐释，相传为孔子所作）同样阐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和对立面双方的相互转化。《易传》把事物的对立解释为阴阳，阴阳是具有最大概括性的矛盾范畴，不只是指阴阳两气，而是指由阴阳两气形成的一切事物及事物的两种对立属性。阳代表男性、主动、积极、进取、热、光明、干燥、坚硬、刚健等；阴则代表女性、被动、消极、退守、冷、阴暗、柔软等。《易传》称“一阴一阳谓之道”，是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由阴、阳两个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这就从一般意义上肯定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易传》也肯定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并认为转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产生新事物。为了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易传》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适时地进行改革变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②</sup>可《易传》与《老子》相反，它强调对立面中刚强方面的决定作用，崇刚、求进，倡导以自强不息为特点的积极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后来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不少辩证法思想又为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

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传统哲学家不能够彻底贯彻辩证法思想的原因，认为除了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外，主要在于没有看到矛盾对立的互相转化的条件性和具体性。毛泽东指出，仅仅是承认事物矛盾的对立的普遍性和相互转化的必然性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必须肯定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否则就会导致相对主义。

---

① 《老子》六十五章。

② 《易经·系辞下》。

例如,《老子》中提出许多辩证法观点,但不讲对立面转化的条件,这就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陷入自然命定论。所以,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不仅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具体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而且还针对《老子》的辩证法,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因此,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后来,毛泽东又引用《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概括对立统一观,认为这就是“两点论”。这种“两点论”毛泽东又用“一分为二”这种民族形式的语言来表述,使关于矛盾对立面的概念,有了概括而简洁的民族表述形式。

对于孔子“中庸”思想的含义,毛泽东给予新的解释。他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虽然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一思想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毛泽东认为“过犹不及”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毛泽东认为,“两端”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而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评析,给它输入了新的理论生命,使之焕发出强烈的时代感。总之,毛泽东认为,对待像孔子这样著名的哲学家,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要从总体上去把握并予以系统的论证。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学习、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毛泽东从不迷信书本上的知识经验,不迷信“上级机关”的指示和精神,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现有的结论出发,生搬硬套地去研究中国的问题,而是从中国实际、中国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修正、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提炼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符合中国人民思维习惯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第二,他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成果,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并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浓厚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这两个特点,使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为“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集中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文化特色,它使用的是中国的民族语言,表述又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它真正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爱和接受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个哲学武器,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打破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来自我们自身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 第三节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 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什么是哲学,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个答案。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就是爱智慧,所以有些人把哲学看成是智慧之学;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哲学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问题既解决不了,也消除不得;也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主题是人,哲学就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导。现在关于哲学最普遍、最通俗的说法是,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总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

家都认为,哲学的使命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所以,自19世纪中期以来,哲学史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发展路线。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发展路线,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为代表,他们把哲学当成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列宁、毛泽东成功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这样,使哲学变得越来越通俗易懂,越来越民族化、群众化、生活化。另一种是贵族化的经院哲学的发展路线。有些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高雅的、深奥的、玄妙的东西,远离大众生活和社会实际去研究哲学,从书本到书本,“言必称希腊”,其语言表达日益脱离群众,其内容僵硬、晦涩,对广大民众的生活不感兴趣。

毛泽东一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而奋斗,为哲学从知识精英走向普通民众的解放而奋斗,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哲学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改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民懂得了:怎样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怎样坚持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怎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怎样做到对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兼收并蓄;怎样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并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哲学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哲学使命的伟大变革,源于他的一个根本理念: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上解放出来,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 一、哲学解放命题的提出与意义

关于哲学解放的命题是毛泽东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18 日,毛泽东出席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了长篇讲话。在讲到团结问题时,毛泽东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联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深入浅出地讲到,要维护好党内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必须学习和研究辩证法。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sup>①</sup>第二,对于同志间的分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批评了有些人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说,有些人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主张对于同志之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40~641 页。

间及各共产党内部之间存在的分歧、隔阂，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以解决问题。第三，世界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他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sup>①</sup>

通过上述分析，毛泽东作出总结，他说：“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sup>②</sup>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让哲学走向人民大众的问题。

毛泽东回国不久就着手落实这一思想，他感觉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切磋后，于1958年1月亲笔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下发全党讨论修改。在这个推向全党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草案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方法。比如：

“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就是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起来了。

“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sup>③</sup>要把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的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但又不能忽视政治。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sup>①</sup>一方面反对空头的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家要懂些业务,要把政治和业务结合起来。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们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sup>②</sup>

“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sup>③</sup>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sup>④</sup>等等。

毛泽东号召全党“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力争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更加感到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在于头脑发热,单纯地追求高速度,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从认识论上讲,认为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

---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5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他提出,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其固有的规律。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任务。他说: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sup>①</sup>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一份中央文件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和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sup>②</sup>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再次提出哲学解放的问题,讲得更加鲜明、更加具体。

1964年8月,毛泽东专门就哲学问题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等人谈话,重申“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sup>③</sup>。第三次提出了哲学的解放问题。

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说明毛泽东真正认识和领悟到哲学的使命和价值。马克思说过,哲学是一个民族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61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sup>③</sup>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哲学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存在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上,不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联系,那么,再深刻、再精华的哲学思想也是空洞的,毫无用处的。哲学只有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才能体现出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那种不关注时代的需要,不提出解决时代的问题,进行所谓纯粹的哲学理论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让哲学从神圣的殿堂回归到普通的民众,从书本到群众的实践,从哲学家、知识精英等少数人手中到广大的人民大众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这一命题的价值还在于,毛泽东找到了培养中华民族哲学思维、提高民族哲学素养的良好途径。哲学的精神在于理性、反思与批判,如果哲学能从哲学家的课堂走向人民大众,并变为他们的精神武器,使他们掌握了哲学的精神和方法,那么,就会大大提高这个民族的哲学素质。

## 二、引导群众将哲学运用于大众实践

毛泽东虽然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提出了这个命题,但是,他引导人民学哲学、用哲学,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走向民众的实践却贯穿在他整个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他通过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输送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下面引证几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 1. 引导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认识创作的“源”与“流”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实践论》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认识的两种形式,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及其相互关系。他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直接经验就是亲自参加实践而获得的认识,间接经验就是从书本或他人那里获得的认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人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

验都来源于客观实践,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所以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延安时期,为了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认识到文艺创作的“源”与“流”,明确文艺工作者方向和目的,毛泽东为文艺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讲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源”与“流”。

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它来源于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对这些文化艺术遗产必须批判地吸收。但是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的外国人的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艺术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人类的实际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有着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更喜爱艺术作品中的美,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又向文艺工作者讲述了艺术作品的特点和它的独特作用。因为“艺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他举例说：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些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在这里，毛泽东以浅显通俗的语言指导文艺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和方法，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才能写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实现文艺的大众化。

## 2. 为党员干部生动地讲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

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只从概念出发，把四者的关系抽象地概括为：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文化是上层建筑，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反映，很难被群众所理解，尽管这些阐述是正确的。毛泽东在给党员干部讲述四者的关系时，是先从实际问题入手，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生活中的故事，人情入理地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政治好比房子，经济就是地基；吃饱小米饭，才能去打仗；文化摸到边，阻止开小差。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他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中长期存在的重政治、军事工作，轻经济、文化工作，认为做打仗工作的人就名誉、就吃得开，搞秧歌、搞小米的人就不名誉、就吃不开的思想，集中阐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首先强调，打敌人的工作应该放到第一位，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就搞不起来。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就是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这种旧势力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任务就

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毛泽东举出了一个事例说明了文化对政治、军事的重大影响。他说，秧歌《赵富贵》、《张治国》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示处罚，说“我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力量。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慢慢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最后，毛泽东概括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又同时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sup>①</sup>

所以，经过毛泽东通俗的讲解，听众既弄清了打仗、搞政治、搞小米、搞秧歌的关系，又解决了实际问题。使他们认识到无论是从事政治、军事工作，还是从事经济、文化工作，都是革命不可缺少的部分，都是光荣的。

### 3. 困难与光明同在，我们一定要胜利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充分估计了我党面临的困难和光明。既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又要看到光明的因素，对胜利充满信心。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可能遇到的十七种困难，包括准备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0页。

挨骂,准备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准备爆发内战,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从一个方面看是困难,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有利的或光明的因素。毛泽东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了这些因素: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吧。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高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的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俯拾皆是。

4. 针对“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观点,讲述个性与党性的辩证法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393页。

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有人提出过共产党只讲党性、不讲个性的问题，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了增强党性原则的决定等等。的确，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严厉批评了“无的放矢”的主观主义态度，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重视对党员的党性修养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个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和七大的结论中详细地阐述了个性与党性的问题。通过讲解个性与党性问题，引导人们要善于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认为，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性质。”<sup>①</sup>而个性，就个人而言，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党员有各种不同的个性。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个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和民主性。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摧残了中国人民的个性，使他们的聪明才智不能发展。他赞扬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的中国国家贫困，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sup>②</sup>所以，中国人民只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会有真正的个性。“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

---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

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sup>①</sup>“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sup>②</sup>

毛泽东还把个性分为两种，即创造性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敌斗争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等，这就是创造性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搞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这是破坏性的个性。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是错误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

#### 5. 是“一冲”还是“两冲”？

毛泽东总是不失时机地对党员群众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宣传教育，他的哲学思想渗透在的讲话、谈话、报告、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往往是从现实的问题或某种观点说开去，准确地捕捉住事物的本质，生动、形象地阐述其中的哲理。本人通读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发现他的多数著作、讲话、报告都有这个特点，有的讲话简直就像一堂生动的哲学课，引人入胜，使人振奋，催人思考。他一直努力地实践着哲学的解放，使之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向人民群众，实现哲学的生活化、通俗化、群众化、大众化。

1948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回忆起十多年的一件小事，讲起了辩证法。他说：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



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能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毛泽东从这个战士简单的“一冲”，引发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要学会全面看问题的辩证法。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把辩证法应用得轻松自如。在谈到为什么人民不喜欢蒋介石而喜欢共产党时，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压迫人民，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而另一方面是共产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上犯了错误，那么，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在讲到如何对待错误时，他说“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sup>①</sup>“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真善美的对立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时，毛泽东指出：“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sup>②</sup>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为了使哲学走向民众,提高人们的哲学素质,毛泽东还倡导人民学哲学、用哲学。“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文,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一本的书。马克思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sup>①</sup>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研究经济问题需要有哲学思维,他说,教科书的写法,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问题,特别是培养全党的哲学思维问题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谈论的问题。他在《十年总结》、1961年的北京工作会议、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谈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他说,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倡导全体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克服盲目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1963年5月,他写下了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用一贯通俗、诙谐的语言开篇写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在文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章中特别强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反复的实践过程,不要怕出错误,有了错误及时总结和纠正。这篇短文,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前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一个哲学反思,也是他纠正错误的指导方法。这篇文章,无论是作为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党内文件,还是作为那时全国正在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到了普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哲学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了当代哲学所应有的品格,体现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哲学只有走到人民群众中间,使之群众化,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也就使哲学大众化,才能发挥哲学的真正作用,起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 第三章 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

###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列宁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都是由英、德、俄文写成，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异域文化，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从而真正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欧洲形式、俄国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具有中国特性、中国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推进大众化。二是在实践中努力推进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即面向大众的宣传、教育、普及等活动。本章主要针对第一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二个方面将在第五章里进行研究。

#### 第一节 分清革命的敌我友

与西方国家相比，现代中国革命是一场特殊的革命。当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当苏联已经开始由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我们却处在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之前的阶段,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还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因此,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错综复杂,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分清。这个关键的问题搞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动员革命的力量,以攻击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曾遭到教条主义的困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受到严重阻碍。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正确地解答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明确了阶级界限,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 一、在敌我友问题上右的与“左”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曾作出过探索,并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等文,但陈独秀等对敌我友之间的界限以及把握此种界限的原则等问题的认识始终不太清楚,尤其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些错误和混乱之处,容易产生误导。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并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上,他夸大了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水平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相比之下,陈独秀更重视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必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因此,陈独秀为当时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拟定的总路线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

样，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自然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那么，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什么要干革命呢？陈独秀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参加革命，只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给资产阶级出力气、卖苦力，而“国民革命”胜利后，一切胜利成果都归资产阶级所有，无产阶级最多只能得到一些“政治自由”。而“中国农民运动，必须中国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sup>①</sup>。这就是说，国民革命胜利后，农民什么也得不到，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房屋，只能等到许多年“农业资本化”以后，农民成为“农业的无产阶级”，再去进行共产的社会革命。试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为什么要跟着资产阶级干革命呢？所以，陈独秀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不但是错误的、混乱的，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实现。

陈独秀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所以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产生错误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他机械地、僵化地、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必定要依靠资产阶级；中国产业落后，各阶级发展不充分，其革命性必定不强。二是由于他没有深入下去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陈独秀出身于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前他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致力于文化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才转向工农大众。他对于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本来就缺乏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感受。当紧

---

<sup>①</sup> 转引自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迫的现实斗争把他推上领导岗位以后，他又没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只是凭借表面的观察来分析问题，这就难免得出脱离实际的错误结论。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为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挤和打击中间势力。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对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动进攻，缺乏必要的准备，“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就是深刻的教训。显然，真正认清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思想上、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而要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做好这件工作，分清、团结好各种各样的朋友，有步骤、有分别地共同打击主要的敌人，要比认识这个问题困难得多。

## 二、对中国革命敌我友的科学分析与论证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住这一关键问题进行思考、总结，于1925年底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先后发表转载在《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等刊物上。他比较科学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得出了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结论。

毛泽东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

敌人。”<sup>①</sup>

怎样正确地分辨究竟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一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把半殖民地中国的阶级状况分为五种，即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sup>②</sup>这样，毛泽东就清楚明确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和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因而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并且要时常提防他们。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说，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既赞成革命又怀疑革命。“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sup>③</sup>这句话，刻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所以，毛泽东对中产阶级的结论是：“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sup>④</sup>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特性，毛泽东提出了应该对这个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实践，都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关于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国的资产阶级问题,的确是一个复杂、很特殊的问题。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既不同于18、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代英、美、法、德、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现成答案。所以,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创造性地研究和剖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则准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把买办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一起划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同时,又科学地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中农(即自耕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这样,毛泽东为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一支由雇农、贫农和中农构成的最广大、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最进步的阶级。

毛泽东的上述见解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为把握和处理国民革命过程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提供了清楚的理论思路。但是党的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陈独秀本来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人,他不仅对于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有帮助,而且在毛泽东被调到上海之后,两人还一起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谈自己的信仰,关键时期给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从此开始,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双方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1926年5~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曾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向学员作过专题讲授,并作为教材印刷

给大家。当时的学员王首道回忆说：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

在讲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的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倒。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宝塔之不倒乎！<sup>①</sup>

最后，王首道深有体会地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排挤和打击中间势力的现象，毛泽东形象地称这种错误是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sup>②</sup>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三十万人剩下不到三万人。

① 王首道：《革命的摇篮》，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09页。

毛泽东特别善于总结实际的经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全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总结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从中分别出左、中、右三种抗日的政治力量，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提出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时期，毛泽东又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特点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认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团结争取他们，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对于顽固势力，中共在皖南事变前后，也有政策的变化。皖南事变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即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1940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他指出：

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以反共为主而定。

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1页。

也就是说，“皖南事变”后，我们党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变，由原来的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被迫改为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但是，我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对其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分清革命的敌我友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敌我友的三元区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为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克服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灵活地制定和实施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根据新的历史任务，不断创新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

建国初期，他提出并实施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恢复了国民经济，实现了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从而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随后，又成功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毛泽东强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斗争，同时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sup>①</sup>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sup>②</sup>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说，在国内，工人和

---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与反革命阵线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分辨中国革命的敌我友,能够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者?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总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思考、研究问题,他不是以现成的结论、观点、方法去生搬硬套中国的实际,而是立足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的阶级结构和政治集团。他科学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sup>①</sup>。这是欧洲各国和俄国都不曾有的特点。如果只是盲目地照搬马、恩、列、斯的结论,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其次,他总是在客观实际的变动中正确把握革命与反革命阵线的变化。毛泽东要求人们学会辩证地思想分析和对待各阶级的变化。他说,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因此,必须根据革命的任务,建立和调整统一战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统一战线的理论,他打破了在革命阵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他不仅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大多数，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人民大众的一员，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尤其是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认识，以及在如何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提出的策略方针、经验办法，是前人所未有过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独特贡献。毛泽东关于区分革命的敌我友的理论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他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民众的力量。所谓唤醒民众，动员民众，教育民众，引导民众，组织民众，就是对这四个阶级的任务，把这四个阶级的力量凝聚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便会从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使命也在于此。

## 第二节 解答人民大众的困惑

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不同欧洲和俄国的特点，客观实际的复杂性、多变性，主观认识的差异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和问题。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为人民群众消解疑惑，排除困难，疏通思想，明辨是非的过程。面对人民大众的提出或存在的疑惑，他总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说明。说服人，教育人，吸引人，这是毛泽东解答人民大众的困惑，引导人民接受、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

### 一、“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80年间，求进步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探

求真理的艰辛过程。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sup>①</sup> 中国人民就是在这种不断地怀疑中继续不屈不挠地思考、探索 and 选择，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17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困扰中国人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认识中国人民反侵略与学西方的问题。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了交流。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是在和平环境和平等关系中进行的，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输入，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输入的。这种文化输入或交流，实质上是西方列强对半殖民地、殖民地所实行的一种同化政策，就像英国在印度的“英吉利化”，法国在越南的“高卢化”。所以，列强对中国输入文化，并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相反，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是配合他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政策。帝国主义对中国输入西方文化,进行文化侵略,显然帝国主义是主动的,而中国是被迫接受,是被动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西方列强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使中国殖民化,成为它们的从属部分;另一方面是中国人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拯救祖国免于被灭亡,走上独立、自主、富强的道路,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西方文化。这样,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大使命,一是以西方为敌,进行反侵略斗争;一是以西方为师,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如何反侵略、如何学西方的问题上,无论是仁人志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存在着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越是学习越是挨打?为什么先生不但不爱护学生,反而总是打学生?这种困惑从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到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原因在于没有认清西方列强侵略的本质和中国的国情,以致不能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等基本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西方的种种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同种种主义的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的实践中会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由西方转移到俄国后,又遇到了教条主义的阻碍,毛泽东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解答了中国人民困惑已久的问题:先生为什么总是侵略学生,从而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主要历史任务。

1939年12月,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了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册子集中阐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目的以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中国自身的传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资本主



义的侵入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直接经营企业，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阶级。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广大些”<sup>①</sup>。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内部的新的阶级对立关系得以形成：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是新生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资本主义侵入导致的这一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的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sup>②</sup>从 1840 年以来，他们在逐步地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帝国主义从领土、军事、市场、财政、金融等方面一步步地控制了中国的，并且，“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sup>③</sup>。除此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使军阀成为它们所豢养的走狗。

所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两个方面的实际历史结果：一是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使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二是它们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又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中国。这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9 页。

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中国现状的成因。

中国社会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sup>①</sup>毛泽东从这一主要矛盾出发，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在这里，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1940年1月，在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大为发展了这些理论，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认清了资本主义侵略的本质以及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后果，也就弄清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就理解了先生为什么总是侵略学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了，对于党员干部和中国人民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 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于敌人的不断“进剿”和“会剿”，由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失败，由于井冈山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因而使党内、党外和军内、军外一部分人产生了右倾悲观情绪，怀疑工农红军和小块红色政权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感到革命前途渺茫，对革命缺乏信心，于是，从1927年冬至1929年春，一再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个问题确实是当时革命斗争中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革命理论问题，如果不及早予以解答，将会动摇党心军心，丧失在农村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使刚刚站稳脚跟的红军力量无法保存下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sup>①</sup>

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在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为大会写的决议案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又进一步科学地、深刻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系统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他写道:“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sup>②</sup>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的现象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各派新旧军阀,进行着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大革命时期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中国革命形势是继续是向前发展的,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全国政权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的取得。第四,有相当力量的军队存在;第五,党的组织的有力量和其他政策的正确,可以保证红色政权的长期性存在及其发展。

不久,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及条件,又进一步作了补充。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其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sup>①</sup>这样,毛泽东就从理论上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根本解决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小块红色政权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问題,从而科学地、深刻地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但是,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一个反复的过程。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前夕,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表现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看法很悲观,对在农村建立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缺乏信心,因而建议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认为,林彪在“新年贺信”中所暴露的错误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他郑重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篇复信(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收入这封信,另拟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将这封长篇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相当于连)党的支部,以教育红四军全体指战员。

在这篇著名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对林彪以及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阐发了“以乡村为中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心”的思想。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sup>①</sup>接着，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又进一步阐述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初步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五，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sup>②</sup>

---

① 参见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这样，毛泽东就在信中明确批评了那种轻视农村根据地而企图以“流动游击”的方式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并指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明确提出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还向全军提出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革命的形势。他说，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欧洲各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它们的反动统治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1927年革命失败后，我们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一点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sup>①</sup>毛泽东预见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全国像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婴儿。”<sup>①</sup>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印刷过油印的单行本。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曾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了这封信。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政治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于“以农村为中心”革命道路理论的阐述，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生动描述，消除了人们的悲观思想，增强了人们的革命信心，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三、“速胜”、“亡国”还是持久战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悲观失望的情绪。另一种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最后的挣扎”。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盲目轻敌，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

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比较，在全国抗战阵营中，认识到抗战持久战的人很多，但是是怎样的持久战？持久到何时？依靠什么力量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规律、进程怎样？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则大相径庭。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面对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下了长达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这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解答了人们思想上困惑，阐明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sup>①</sup>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他通过对中日双方基本特点的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且，他还预测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提出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sup>②</sup>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511页。



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在公开出版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他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那么，当年这部著作的反响如何？它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有没有触动呢？曾经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过的程思远先生，在他写的《我的回忆》中披露了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除了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之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精辟的分析判断，她找到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可见，《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

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论持久战》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它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篇军事著作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生动体现。

#### 四、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黄炎培向毛泽东问了一个他困扰已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尚未执政,但作为忧国忧民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黄炎培预见到中共将来执政的前景,开始为她的前途命运担忧。黄炎培返渝后,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谈到了他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这样写的: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览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为,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

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sup>①</sup>

毛泽东当时对黄炎培先生的回答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最基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六十多年的建国史表明，人民民主的道路是一条成功的道路，“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如何使人民选举政府，监督政府，而政府又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第一，及时给全党敲响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早在1944年3月，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载于重庆《新华日报》。该文着重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人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从《新华日报》读到郭文，立即看出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对中共的教育意义。延安《解放日报》于4月18、19日全文转载郭文，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

---

<sup>①</sup> 转引自刘振华《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6页。

《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毛泽东在延安党校第一部讲演时，明确把郭文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大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整风的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sup>①</sup>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sup>②</sup>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又教导全党决不当由于革命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记住这个真理。

第二，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个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其国体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人民共和国，意味着由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集团组成的中国人民，开始以民主的国体和政体来管理国家了。这是一种既同封建专制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制度，又同康有为、梁启超追求的君主立宪制，孙中山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sup>①</sup>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建国宪章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国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sup>②</sup>这样，就把人民选举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利用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三，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建国。毛泽东的多党合作建国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形成了代表民族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资产阶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斗争中,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局面。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各民主党派在建国中的作用。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在联合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2/3,中间与右翼占1/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稳步地实现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权有责,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sup>①</sup>

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代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在说服黄炎培出任公职时,周恩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民建主委黄炎培淡漠仕途,在建国前就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无意做官。有一次,毛泽东问他:“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决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诚恳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报定初衷,说自己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周恩来回答说:“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已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黄炎培被说服了,他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出任政府公职。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在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副主席共有6人,其中党外人士3人,他们是: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56人,其中党外人士27人,占将近一半;在政务院的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他们是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名;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具体任职如下: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	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上述安排,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建国思想,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积

极性。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正式形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多党合作有利于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和建设的是人民共和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自身严于律己外，还要有人民群众及一些政治力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sup>①</sup>邓小平后来也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sup>②</sup>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监督。这种监督当然包括共产党监督其他党派，但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因此“互相监督首先是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

### 第三节 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科学预见和正确解答，解除了人民群众的疑惑，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声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5页。



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因此，“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sup>①</sup>。但是，武汉失守后，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不但蒋介石要共产党改名，就是某些中间派人士也加劝说。如张君勱致信毛泽东，提出中共既参加民族战争，应“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左舜生说：“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不叫共产党，我就参加。”叶春之流也叫嚷“收起共产主义”等。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驳斥了顽固派反共叫嚣和某些人的“左”倾空谈，分析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回答了种种非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是怎样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 一、开宗明义：建立一个新中国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国情。这种社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所谓民主主义革命，现在已经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所以，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 二、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另一方面，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不容许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企图使中国成为类似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已无历史的可能，“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出现。<sup>①</sup>既然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又不能走土耳其式的资产阶级道路，那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中国只能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走上社会主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义的道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且由于它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呢?毛泽东认为也不可能。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批评了那些混淆这两个阶段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这种观点降低了对当前阶段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所以,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sup>①</sup>

### 三、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两个革命

顽固派叫嚣: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意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么,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对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4~685页。

此,毛泽东指出,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正因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意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毛泽东比较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自从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个阶段了。”<sup>①</sup>因此,“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sup>②</sup>

通过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一个独立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中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sup>③</sup>这样,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公开亮明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前途的态度。

#### 四、争夺中国之命运的较量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在中国政坛激起了强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反响,各党派纷纷著书立说,阐明对中国前途的态度。1943年3月,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著作,公开阐明中国的未来要按照他的政纲作安排。

《中国之命运》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蒋介石指出: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这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地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它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它诬蔑共产党员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这本书列为“必读之课本”,通令国统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都要阅读。

可以说,争夺战后中国之命运的一场大较量,在这时,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就开始了。

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改署陈伯达个人名字。1943年7月21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

运》)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sup>①</sup>

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组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驳斥法西斯主义，还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的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以鲜明的语言，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的意志：“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sup>②</sup>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他还列举了实现这种光明前途的几个条件：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助。要实现这个前途，尽管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sup>①</sup>

这场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关于中国前途的大论战、大交锋，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上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正是这场争论，中国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直接地、面对面地、具体地争论了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通过这场争论，不但他们之间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更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次论战，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任务是什么，革命的目的在哪里，怎样才能坚定必胜的革命信念。没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上就无法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区别开来，就会在思想上软弱无力，麻木不仁，就不能抵御和清除来自党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总之，这次关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思想交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第四节 建立人民大众的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包括文化理论，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框架主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而不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政治都有过论述，也多次谈到文化问题，却缺乏系统的文化理论，甚至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一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页。

致。例如，列宁在多数场合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也理解为物质性的东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社会，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分析，其中对中国文化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①</sup>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阐述。毛泽东还提醒全党，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两个观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和“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认为，“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sup>②</sup>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一观点分析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不断使之大众化，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动力。

### 一、推进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认同

由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要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解决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认同问题。毛泽东十分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文化背景相结合来考虑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他不但从理论上，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努力推动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认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为我们揭示了正确把握人民群众文化认同心理的重要性。这就是“土”、“洋”关系问题。他在“文化运动”一节中指出：“‘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到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sup>①</sup>

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从理性的角度看，当时的“洋”代表着“科学”与“民主”，而“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农民为了求得解放，应该欢迎“洋”的东西而反对“土”的东西。但从农民的文化认同角度看，如果洋的东西不能进入农民自己的生活，不能成这农民意识到的需要的东西，而且在形式上，洋的东西是以冷冰冰的态度甚至是轻蔑的态度对待农民，农民从感情上和心理上就不会欢迎它，即使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文化对农民是有益的。毛泽东所揭示的这种文化现象，正是他能够理解支持农民的根本所在。毛泽东不但重视知识理性（真理）本身，但他更重视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重视真理在某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下获得贯彻和实现的可能性问题。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中，毛泽东就曾将“打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

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打倒洋财东!”。这种名词的改换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它说明,毛泽东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文化背景起来思考知识理性与文化认同的整合问题,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与农村的革命变革、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化水平的结合问题。这正是毛泽东能够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使之大众化的原因所在。陈独秀作为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确实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并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者的文化观念为依据提倡思想解放,后来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党,但他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使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认识、了解,轻视实践问题,他专注于认识理性而忽视在社会实践中去寻找文化认同的方法。因而,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他和毛泽东完全相反,他看到的是农民的落后、保守、散漫,看不到农民的革命性,而毛泽东所看到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的途径和方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广大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感情上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了解他们群众,熟悉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愿望、需要,关心他们的疾苦,尊重和满足他们的利益,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文化上得到他们的认同。毛泽东列举了自己感情转变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穿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

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sup>①</sup>

其次，要善于运用群众的语言，以调查来的典型事例，向群众讲解革命的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彭湃在海丰宣传革命、组织农会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写道：“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一连几天，一无收获。”<sup>②</sup>后来彭湃认识到由于他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于文雅，好多话农民不懂，于是彭湃把许多书面术语翻译成海丰俗语。“农民惯受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总不喜欢和我接近。”<sup>③</sup>后来，他学会了农民的语言，感情也相通了。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强调：“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sup>④</sup>

## 二、培育人民大众自己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搞了几年工人运动。在工人运动中，他循着建设平民主义文化的思路，主办文化书社，开办工人夜校、补习学习和自修大学等，竭力把一种劳动者自己的文化灌输到群众中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852页。

② 转引自叶春主编《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③ 转引自叶春《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924年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放在农民问题的研究上,他除了发动农民运动外,认真研究农民文化,提出了用农民文化取代地主文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构成了他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前身。

毛泽东认为,既然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那么,建设农民文化便是整个民主革命文化建设的中心。怎样建设和传播农民阶级的新文化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不破不立的辩证思维方法,提出了只有铲除地主文化,才能生长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

毛泽东所说的农民文化,并不是传统的小农文化,也不是农村文化,而是对传统小农文化改造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农民文化。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村是地主的天下。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在文化上也占统治地位。“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sup>①</sup>。毛泽东说,农民没有文化,是说地主霸占着农村的文化教育阵地,使农民不能享受文化知识;同时用地主文化作为统治文化,把地主文化强加给农民,奴化和麻痹农民。所以,地主文化是建立在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sup>②</sup>。地主文化就是封建主义文化,它是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对象。

地主文化传播的根本途径是教育,由于他们掌握着教育的大权,贫苦的工农等人,“终日不得闲,没有饭吃,所以受教育的机会过少,演成大多数人目不识丁”<sup>③</sup>。二十多年后,毛泽东更深刻地指出:农民所以无文化,就是因为不能受教育;农民所以不能受教育,就是因为他们无权。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③ 转引自黎永泰《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sup>①</sup>

那么,在革命中培育的与地主文化相对抗的农民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呢?新形态的农民文化,只能是适合农村革命要求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新形态的农民文化具有五大特征:第一,它必须“以农民的需要而定”,必须适合农民“经济的解放”;第二,传播新文化的学校,必须由农民掌权,“是农民协会办的”;第三,这种文化将有利于“农民自己的团结”;第四,它服务于农民革命斗争,同时是农民“在经济上能够舒一口气”的产物;第五,乡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必须热心传播农民文化,“与农民有合作之可能”。<sup>②</sup>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形态的农民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是切合农民大众利益的,为农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是农民自己创立、自己传播、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文化,是纳入了民主革命总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虽然毛泽东此时并没有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概念,但是他在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质内容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改变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把文化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唯一出路的片面看法。他把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统一分析,肯定中国社会出路在于进行一场全面、深刻的革命。他强调政治、经济革命对文化革命有决定作用,必须以政治、经济革命来促进文化革命。事实上,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在伟大的农民斗争中,封建的尊卑等级观念被无情扫除,从前的泥腿子、脚上有牛屎,长着一双粗

<sup>①</sup>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sup>②</sup> 转引自黎永泰《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糙的黑手，如今在乡间扬眉吐气，掌了权，说话算数，他们把“天地君新师”的牌位丢在一边，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前只知三从四德的妇女，如今昂着头走路，不仅与男人平起平坐，而且敢冲进祠堂里去讲个理。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制度，都随农民权力之升涨动摇起来。农民革命焕发了出了前所未有的扫荡封建文化的伟大力量。

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经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农民文化的认识更深刻了，对传统小农文化的基础、价值观、小农心态、农村教育、农民习俗、生活方式、各种风俗的流变、文化冲突等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由于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他们把种种小农的心理、小农的文化价值观念带入红军。所以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中，必须仔细研究农民的心态，小农文化的心理和小农文化的价值观。他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观念、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具有小农文化意识的错误思想，亲自拟定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对传统小农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它不仅在红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同时，毛泽东又大力提倡和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如艰苦奋斗、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英勇献身等高尚情操。毛泽东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与无产阶级的理想、情操、价值认同、斗争精神、思想品行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传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体现。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系统地论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的理论。<sup>①</sup>

首先,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就这种文化的价值观而言,“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就它的文化个性而言,“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民族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就它的性质而言,革命的民族文化,“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民族文化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和全世界一切进步文化结成联盟,反对一切反动文化。就文化发展的方法论而言,这要求处理好中外关系。它决不拒绝外国的文化遗产,一切外国的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凡属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要防止形式主义的吸收。总之,从民族性角度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其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从它的科学性而言,“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封建迷信,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就文化发展的方法论而言,它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清理。“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但又不是颂古非今,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就文化的功能而言,文化的科学性要求形成反映时代根本特征的时代精神,用时代精神引导群众。“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

<sup>①</sup> 以下该引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9页。

再次，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就大众化的价值观特征而言，它必须是为大众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就方法论而言，它要求“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的文化对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武器。就文化的形式而言，它必须采取符合大众特点的形式。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一个彻底革命的文化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史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纲领，不仅在当时的实践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其后中国文化建设也提供了巨大的指导和学习的典范。

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展开了他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历史文化特色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它成功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实践的过程，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不断大众化的过程。

###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形态的大众化

中国先进分子对于外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起便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一个重要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文化形态能否和中国文化相通的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胡适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他认为传播是没有根据的。他从实用主义的片面立场出发，把一切文化现象都看成是应时的工具，是针对具体环境而发生的，它们只有个性，没有共性。一种文化只能适应一种环境，不可能适应其他环境。主义也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学的根据。他还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共性”只是一种人为的抽象，是和个性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样，他又进一步割裂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李大钊驳斥了胡适的观点，他肯定主义作为文化的共性，即普遍性，对于认识具体现象具有指导意义，“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国，大致都很相同”。他说，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就在于它具有共性，欧洲人能接受，中国人也能接受。他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灵活而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从文化学的角度最早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

毛泽东根据李大钊的观点，全面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必须和中国实际的个性相结合的问题。他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

第一，作为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共性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能把它个性的东西，即现成的结论，全部照单收下。为此，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以研究方法论为主”。“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

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sup>①</sup>

第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共性的东西,就是把它从个性中抽取出来,再把它应用于中国的实际,转化为个性的东西。当共性脱离个性后,便变成了抽象的东西,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把它再次转化为个性的东西,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变成有血有肉的新东西。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sup>②</sup>毛泽东要求实现由共性向个性的回复,由抽象向具体的回复,有了这个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马克思主义便获得了新的个性和生命,就有了全新的特性。毛泽东思想就是具有这种新和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所言:“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sup>③</sup>

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这种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共性在中国个性化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的过程。个性化不仅包括个性化的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方针,而且还包括个性化的民族形式。只有有了个性化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具有个性化(即民族化)的群众所接受。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获得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就是获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表现形式的过程。事实上,经过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探索,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不再是外来的东西,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应用中,才能获得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为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 第四章 深入浅出,喜闻乐见

### ——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语言形式上通俗化、形象化、生动化方面。毛泽东以他的博学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他是语言大师,善于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简洁、精炼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善于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来揭示深奥的理论。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献中,处处可见他高超的语言艺术:高度概括,巧用比喻,活用成语、典故、警句,幽默风趣,形象生动。正是毛泽东的率先垂范和大力倡导,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得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 第一节 以高度概括、生动活泼的 语言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

为了使中国的人民大众理解、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非常注重将理论加以提炼、概括,甚至压缩成一两句话,形成比喻或警句,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

## 一、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形象表达

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农村，以井冈山为依托，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开辟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总结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斗争经验，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要使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深入群众，被群众所掌握，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是因为，井冈山等农村根据地地处偏远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条件异常艰苦，又时常处在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中，而红军战士和农民又基本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对他们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必须运用人民群众熟悉的、听得懂的语言，既要通俗化，又要生动化、形象化。

### 1. “人要有屁股才能坐稳”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必须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没有根据地，红军就变成没有坚实基础的流动式的武装，土地革命的成果也不能巩固。但根据地又时常面临着艰难的困境，物资匮乏，缺医少药。“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

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sup>①</sup>在寒冷的冬天,战士没有棉衣,只能穿两层单衣御寒,没有床铺、棉被,就只好以门板当床,用稻草当棉被和棉褥。1928年冬,红四军的伤病员达800多人,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中央和省委的帮助也无法实现。在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非常注重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教育,他用浅显的语言反复给官兵讲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他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好像人要有屁股;人没有屁股不行,革命没有根据地也不行。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人若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直至最后胜利。在这里,毛泽东用“屁股”作比喻,深入浅出,效果非凡。

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带领军民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没有西药,就发动群众上采集草药,还办起了红军医院。没有粮食,就发动群众挑粮上山,储备粮食。粮食主要是从宁冈的大陇、茅坪等地,运到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和茨坪储藏起来,途中要翻越海拔1382米的黄洋界,往返要100多华里。毛泽东、朱德等带头参加了挑粮运动,使广大官兵深受鼓舞。全体军民共同努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了井冈山的斗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3页。

## 2. 动员民众建立工农兵政府的号召书

如何使军民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四军的主要任务，1929年1月毛泽东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共产党宣言》。这两个文件是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来向赣南和闽西的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写下了这样诏告天下、动员民众的檄文：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并交，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是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的名义发布的。宣言说，“中国的革命现在还是民权革命的阶段”。这个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革命的东西。第一，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自己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把田地平均分给农民。第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宣言的最后还发布了十大政治纲领，作为达到以上三项任务的具体方案。发出号召：“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sup>①</sup>

这份布告和宣言，读起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它熟练地运用了民族的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深邃的阶级斗争和政权革命的理论思想。这种雅俗共赏的语言和形式，是对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进行革命宣传和启蒙教育，亲近他们并易于为他们接受的好形式。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的文化典型。

### 3.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国家政权学说和暴力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都有大量的论述。列宁就明确指出过，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斯大林也认为：“在中国，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sup>②</sup>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论证了军队与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sup>③</sup>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国家政权学说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突出了军队与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具有简洁明了，好记易懂的特点，因而广为流传，影响巨大。

毛泽东早在1927年8月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就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分析了几个月以来国民党背叛革命、血腥镇压工农运动的惨痛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不懂得做军事运动。他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sup>①</sup>毛泽东提出这一著名论断，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曾对整个会议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8月18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明确地阐述了依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思想。他说：“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权，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sup>②</sup>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但在理论上深入地阐明这一道理，并为全党认识和接受，却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当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将秋收暴动的计划汇报给中共中央时，中央认为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湖南实际情况的秋收暴动纲领。在秋收起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过去我们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掌握枪杆子的亏；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打倒中国的反动派。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sup>②</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这次暴动，我们虽然受了点挫，但这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从失败中认真总结教训。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好比一块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的那口水缸！于是，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到敌人比较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去，找个“落脚点”。这样，起义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sup>①</sup>，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殚精竭虑地为缔造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而努力。同时，又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地方武装，把武装群众作为正规军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28年2月，他在发动群众武装的动员大会上指出：敌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手里的武器。我们为什么能打垮敌人？也因为我们手里掌握着武器。因此，只要大家拿起武器，就不愁打不垮反动派。<sup>②</sup>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再到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八路军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着“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同时，这一思想理论在实践中也逐步被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总结了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学说，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对中国革命为什么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了透彻而深刻的阐述。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极具有征服力和影响力，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接受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后来，毛泽东又把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作为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定。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深入浅出地解说这一问题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② 参见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首先，毛泽东运用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方法，分析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他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sup>①</sup>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的这番话，也是针对王明等喝过“洋墨水”的同志不懂得武装斗争，只是一味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做法的严厉批评。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所以，他得出结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sup>②</sup>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国民党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战争史，教育全党研究国民党是如何注意战争的，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大革命时期和王明统治时期的教训，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的政治和战争问题。他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sup>①</sup>接着,毛泽东又指出,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党在大革命时期的沉痛教训,以此警示和教育全党要重视军事斗争。在这里,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透彻明白,使全党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高度概括、简单明了的语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蕴含着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准确把握。毛泽东的通俗阐释,使中国人民认识和掌握了武装斗争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 4.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中国革命为什么走以农村为中心的道路,而不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和俄国不同的国情和特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必须是农村。为了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毛泽东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中国复杂的国情特点。他用“六个同时存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失去一部,还有一部”、“豆腐块”等概括、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为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提供了可能。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毛泽东用“六个同时存在”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46页。

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sup>①</sup>这种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状况为中国革命以农村为中心提供了哪些可能呢？毛泽东又深入浅出地作了分析：

首先，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sup>②</sup>而中国则不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sup>③</sup>。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地方性农业经济占90%，农村人口占80%，这种地方性的农业经济有相对独立性，能够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广大的人力物力。

其次，提供了有利的阵地和战场，这就是广大的农村。帝国主义及其军阀的主要力量只能达到近代的工商业都市，而广大的农村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不能形成直接的支配力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力量甚至根本达不到，特别是在那些军阀割据间的“三不管”地区，如各省的边界，就更是如此。这就为中国革命从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村入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有回旋的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失去一部,还有一部”。中国的条件与西班牙不同,也不同于法国。“西班牙国土太小,没有多少地方可走,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可用,所以他们采用坚守马德里的战略;中国则不同,我们可以走,地方很多,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国土有十七八个法国那样大,人口也有几个法国那样多,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sup>①</sup>这样内外夹击,才能把鬼子赶出全中国。

再次,提供了胜利的可能,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以“豆腐块”作比喻,生动地讲解了乡村的持久战一定取得胜利。1938年3月,陕北公学的一部分青年学生要毕业了,他们请毛泽东来讲一讲。毛泽东欣然从命,他针对有些人思想上存在的“如果武汉失守,中国会不会亡国”的担心和困惑,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讲道:“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

---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5~106页。

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sup>①</sup>“从几条大路来看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从国际范围看，日本虽然包围了中国，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又包围了日本。……中国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斗争相联结的。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sup>②</sup>。

在这里，毛泽东讲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哲理，把一个原本深奥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化解为学生看得见的学习、生活问题，化解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讲得生动、具体、形象，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学生。从这个真实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 二、对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生动概括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和实践中，毛泽东不仅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通俗地、直白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思想，而且还同样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概括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些脍炙人口的语言早已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这些方法内涵深刻，富于哲理，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7~108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通俗易懂，它教会了党和人民如何防止和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如何探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理。

1.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194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我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看到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毛泽东把我们党成熟的、成功的领导方法，特别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第一次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人们今天都非常熟悉的工作原理和经典语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支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sup>①</sup>

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来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大体经历三个紧密相连的环节：（1）深入群众广泛收集群众意见；（2）加工群众意见形成领导决策；（3）发动群众执行并检验和丰富领导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起来。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使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就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过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把这样复杂的认识实践过程，用一句简单通俗的语言概括出来，既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又便于人民群众所掌握，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语言艺术上的突出表现。

#### 2.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关于调查研究和认识、解决问题的关系，毛泽东有两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两句话都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前一句讲的是调查研究与认识问题的关系。“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sup>①</sup>第二句话讲的是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系。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无非有这样几种办法：一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二是直接照抄照搬书本或他人的经验；三是不作调查，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后两种办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还会把事情弄坏,失掉群众。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生动地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sup>①</sup>“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sup>②</sup>他把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甚至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找到了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办法,这就是调查研究。民间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只有认真地去,才能摸清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明,政策就正确,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头。毛泽东一生坚持调查研究,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之所以能够实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得益于他调查研究的活动和办法。可以说,不了解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和办法,就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克服了教条主义,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在思想上理论上成熟起来的。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他的调查研究也从农村开始。1925年初,他回到家乡韶山养病,在这期间调查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阶级状况和社会情况。这年底,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1926年5月,在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组织和引导学员做调查,要求学员把家乡的情况写出来,调查的项目有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项。将这些调研情况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并为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此写了序言《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这年底，在家乡做调查工作，写出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7年春，在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做了较为详细深入的农村情况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做了宁冈、永新两县的农村社会调查，1930年5月，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对调研工作，从思想理论到方法技术，做的第一次阐述。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为解决农村土地政策，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寻乌调查》，寻乌调查是他以前历次调查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查，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同时我对工商业状况是完全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气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用十多天的时间，以开调查会的方式，对寻乌县的政治、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而且调查了城镇，尤其对寻乌县城的商业作了重点调查。1930年5月，写成了长达8万多字的著作《寻乌调查》。今天我们阅读这篇巨著，仍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细致深入的研究方法，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当时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却独树一帜，深入革命斗争第一线，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政策，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而艰苦奋斗。

毛泽东不仅亲自实践，而且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全党开展调查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继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之后，第一次把调查研究工作立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制度

和行为准则。号召全党把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建国后,毛泽东通过批阅大量的文件,宣传和推广调查研究的工作。他亲自指导过三次调查活动。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看过来自各省的一百几十篇材料,编写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第二次是关于论十大关系问题,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同三十四部门的负责人讨论,写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三次调查是在1961年。

毛泽东积极倡导调查研究,而且还总结出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即怎样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第一,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sup>①</sup>第二,要坚持长期做实际调查。调查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第三,不要“走马观花”,要“下马看花”。毛泽东说,调查研究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再去研究别的地方。若是走马看花,就一辈子也了解不了问题的深处。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很不够,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仔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第四,调查会等等。

### 3. “批判吸收,为我所用”

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如何吸收、利用外国的先进经验、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毛泽东形象地概括出“批判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和方法。这一思想方法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首先，毛泽东用形象、概括的语言，提出和分析了两个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文化方法论问题：一个是正确地对待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反对“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一个是正确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反对“颂古非今”。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外国古代文化，资本主义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sup>①</sup>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在对待外国文化问题上，“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总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sup>②</sup>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强调整理和分析的方法。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就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切中国文化，都需要加以整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才能“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sup>③</sup>在整理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体现了毛泽东开放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理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批判精神。

其次，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任务。以批判吸收、为我所用的态度和方法，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先进的经验和管理、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等。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利用外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sup>①</sup>这段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略去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外国做生意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sup>②</sup>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毛泽东提出既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sup>③</sup>他认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应该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天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大会上，毛泽东又生动地阐述了把外国所有好的东西统统拿过来的思想。他说，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外国有用的东西就是要学。……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

---

① 见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第5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2页。

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一搞久了就变成中国的了。<sup>①</sup>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和方法。

#### 4. “一拉二推三打”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也是幽默大师，擅长形象思维，比喻生动贴切。“西安事变”后，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怎样给党员干部及战士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之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当他听说红军大学里有不少学员心存疑虑时，还在保安红军大学作了一次重要的报告。毛泽东在这次报告中，用了一个陕北老百姓所熟悉的赶毛驴上山的生动比喻，解决了他们的思想疑虑。他说：陕北不同于南方，这里的毛驴很多，小毛驴有很多优点，有耐力、负重，是农民很好的交通工具。老百姓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就像我们陕北的毛驴一样，他不愿上山抗日，我们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他就会上山。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要抗战就要联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拉蒋和推蒋，就是团结和联合的办法。这样，毛泽东就把党的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政策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接着，毛泽东进一步讲到，陕北的小毛驴也有缺点，很倔强，有时不听话，还会抬起腿子踢人的，我们要提防着这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蒋介石集团还会有消极妥协的一面，我们

<sup>①</sup> 参见刘振华《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人民中国出版社，第252页。

要对他进行斗争,还要经常采用不同方法“打”他一下,“打”他是让他清醒,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

这一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报告,像一盏明灯,照亮了红军大学学员的心坎,也把中共对统一战线采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阐述得新颖别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能及时把握团结和斗争的度。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民党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对抗战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毛泽东根据这种实际情况,积极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肯定和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事迹。对其不敢发动群众的一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斗争。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sup>①</sup>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只要蒋介石抗战,我们就要拥护他。1939年6月,他在《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说:“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sup>②</sup>但他又提醒全党,蒋介石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也是存在的。那时,我们不能不有表示,但必须是适当的,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当国民党消极抗日,连续发动反共摩擦,尤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是以斗争为主的政策。194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关于皖南事变后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sup>①</sup>不仅在政治上、宣传舆论上的斗争，还敢于在军事上揭露和打击其反共阴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下来。

### 三、对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通俗解读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史任务创立了一整套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目的是人民战争，即如何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如何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如何制定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四个字基本概括了毛泽东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部特点和基本内容。毛泽东说过：“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sup>②</sup>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导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活剧，创立了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战略战术，而且绘声绘色地把这一活剧表演出来，以民族的、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传递给广大民众。有的高度概括，有的生动活泼，有的巧用比喻，有的借用中国古代的典故、警句，这些形象的语言，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通俗易懂，学起来便于掌握，使那些不识字的老战士和群众感到亲切、自然。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 1. “兵民是胜利之本”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主体和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为了使广大民众理解什么是人民战争，如何进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运用极为朴实、极为生动的语言来教育军民。他把人民群众比喻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蒋介石为了“围剿”革命根据地，曾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据统计，至1934年1月底，江西共筑碉堡4000多座，这就是蒋介石的堡垒政策。对此，毛泽东说，国民党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sup>①</sup>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已被历史所充分证明，人民战争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堡垒，而且也打破了后来日本侵略者反动堡垒，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发动民众进行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打的。”<sup>①</sup>毛泽东用“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来形容日本侵略者已陷入中国人民群众的包围中，生动形象地将人民战争的伟力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 2.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态势下，如何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是人民军队面对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制定了以弱胜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什么是积极防御？毛泽东用通俗语言作了解读。积极防御是真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实力的防御；消极防御是假防御，是单纯的防御，是“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sup>②</sup>。第五次反“围剿”采取的就是消极防御的路线。毛泽东讽刺了这种思维方式，他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发问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sup>③</sup>。毛泽东还运用中国古代的典故，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精彩地概括为三点：一是老子的哲学。老子说：“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二是《左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要让一下的意思。三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sup>①</sup>这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极其精辟、深刻的说明。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下，毛泽东还总结阐述了具体的战术和策略原则，比如：

-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 诱敌深入，各个击破；
  - 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
  -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人，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把这些战略战术表达得这样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在革命实践中，这些思想很快融入到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变为他们实际的行动，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大众化在军队中全面展开。

### 3.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又是“真老虎”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当这位记者问到毛泽东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苏联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接着，他论证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sup>①</sup>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实践已经证明，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一定会打败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精辟论断，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这一论断，通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笔，传到了中国，传到了世界，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警句，也成为西方人最常引用的“语录”。

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这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战略思想。他要求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它们斗争，对胜利充满信心。同时，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上，要重视敌人，讲究斗争艺术，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孤立和消灭敌人。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提出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他说，前几年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老虎又是纸老虎。”“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sup>①</sup>毛泽东还把这一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会遇到不可胜数的问题和困难，也需要树立起这种战略战术思想。一方面要有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要有藐视一切的乐观主义态度，相信可以完成，能够胜利；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sup>②</sup>。

毛泽东以“纸老虎”、“真老虎”作比喻，来说明当我们遇到强大的敌人和巨大的困难时，应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战略策略思想。生动形象，富有哲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经过广泛传播，深入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和生活实践中，成为人民群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人民不怕压力、不怕苦难、艰苦奋斗、争取胜利的一种工作方法

---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45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和思想方法。

#### 四、对教条主义现象栩栩如生的刻画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根本原因，除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外，还在于来自自身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首先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找到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概括、比喻、幽默、诙谐的语言，揭示出教条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原因，使广大党员干部很容易入耳入脑，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本质，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 把“左”倾教条主义概括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毛泽东引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水浒传》中林冲与洪教头比武的故事和春秋时期的曹刿之战，来说明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战略退却是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先是冒险拼命，再转到军事保守，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

毛泽东生动地讲道：“《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sup>①</sup>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总结出游击战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毛泽东依据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指挥红军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三次“反围剿”胜利。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撤销了这一整套正确的游击战争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所谓的“新原则”。“新原则”认为,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讽刺地列举出“新原则”的内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无疑,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sup>①</sup>

毛泽东通过历史故事和生动的语言,对两种退却战略进行了比较,使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更加认清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

## 2. 用一副对子为教条主义者画像

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是党内最大的危害。教条主义者习惯拿本本去框实践,照本宣科,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和公式,把别国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到处“引经据典”,断章取义,根本不去考虑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情况。不仅如此,教条主义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毒害性,因为教条主义者往往以“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易被理论素养低的人所识破。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从思想上教育全党,毛泽东以非常激烈的言辞,指出了教条主义的表现和危害。许多同志似乎是为了马、恩、列、斯而去学马、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恩、列、斯，并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所以，学的虽多，消化不了。引证马、恩、列、斯的成语是很会的，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是不会的。这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及青年学生，害处很大。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态度，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就有打倒它的必要。”<sup>①</sup>毛泽东还引用一副对子，为教条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还建议，如果有人真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把它贴在墙壁上。

### 3. 痛斥党八股的八大罪状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以生动、诙谐的语言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这篇“申讨党八股的檄文”，对于全党清除党八股的流毒，树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开篇，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他说，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身的地方。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

第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第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

第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彼此不知心，乱讲一顿。

第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瘦得难看。

第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真切的内容。

第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发表出去，不懂得文章演说是专为影响人的。

第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sup>①</sup>

这是对党八股栩栩如生的画像。党八股极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如果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 第二节 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阐明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840页。

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这一语言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这一语言艺术发扬光大，通俗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一、对新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形象概括

#### 1. “四面八方”

1949年4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了让人们正确理解把握这个“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sup>①</sup>在四个方面的关系中，毛泽东还强调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必须正确处理这两个关系，否则，经济就不能发展，政权就不能巩固。他说：“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

---

<sup>①</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sup>①</sup>“‘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sup>②</sup>

1949年9月,“四面八方”的方针写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特别谈到了公私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各地和有关部门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通过调整农业和工商业税率、退税等方法,减轻农业和工商业的负担;政府在国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价格政策、市场管理等方面采取了有利于私营工商业的经营的措施,使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以发挥他们在发展生产上积极作用;对于劳资关系,则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的原则,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各

---

<sup>①</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sup>②</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种问题。总之，经过多种措施的实施，私营工商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歇业减少，开业增多；私营工业生产量增加，市场活跃，交易量增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 2. “不要四面出击”

建国初期，毛泽东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对民族资产阶级要“乘胜挤垮”的“左”的情绪和做法，形象地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

由于革命胜利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破坏，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原因，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上遇到一些困难，一批工厂商店由于商品滞销、周转不灵而停工歇业。在困难面前，资产阶级惶惶不安，他们把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人民政府的税收、公债，甚至怀疑人民政府的政策变了，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形容自己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其次，失业的工人、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人民政府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么苦”。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土改，又要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在一些干部中，由于革命胜利滋生了一种“左”的情绪，他们主张把资产阶级挤垮，早日实行社会主义。比如，对资本家提出的不要与民（这里“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问题，一些干部说我们就是要“与民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的干部说，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对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过“左”的做法，不让教授上课，不让旧艺人演戏等。这些“左”的思想和“左”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间的

紧张关系，极大地妨碍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这一任务的实现。

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这些“左”的思想和行为的存在，认为这些做法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骄傲自满。于是，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专门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我们必须确立进攻的重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毛泽东指出，在今年秋季，我们将在 3.1 亿人口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这场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胜利后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现在我们在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失业的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农民也有意见。“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

人民中间就孤立了。”<sup>①</sup>

“不要四面出击”，形象地概括出党在建国初期的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被全党接受下来，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它使我们从战略高度上划清了敌友，明确了打击的对象和团结、依靠的力量，有力地保证了争取财经状况基本好转任务的顺利完成。

### 3.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将新中国的对外方针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现实，尤其根据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作出的重大决策。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作了阐述。“另起炉灶”，就是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和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sup>②</sup>采取“不承认”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使新中国一开始就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1949年1~2月间同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首先提出的。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毛泽东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来描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他们肯援助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sup>②</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我们那就更好,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sup>①</sup>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我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们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sup>②</sup>

“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它有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因素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事实上已形成两大阵营的对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情、支持中国革命,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却没有改变它们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指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提供援助,还不能不考虑来自帝国主义方面武力威胁、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只能向社会主义阵营寻求真正的国际援助,而且“不能同时两面树敌”。当然,“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做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生动、形象地表述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的基本方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生动表达

### 1. “主体”与“两翼”

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生动地比喻为“主体和两翼”。他解释说，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生动的比喻简单明了地向人民大众阐释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sup>9</sup>9月，党中央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经过了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从中央高层到省、市、县，再到全国人民。

为了学习宣传总路线，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后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这样完整的表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sup>①</sup>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毛泽东用“主体”和“两翼”比喻“一化三改”，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701页。

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说,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sup>①</sup>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首要问题。从当时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50~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反复比较论证,选择了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道路。为了让全党和人民理解认识这一问题,毛泽东形象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是从国内的实际情况看,旧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所依靠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几乎没有重工业,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没有现代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sup>①</sup>在1952年，我国钢的年产量人均只有2.4公斤，棉布的年产量人均只有9公尺。只有建立起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

二是从中国近代历史上看，由于过去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欺侮。“落后就要挨打”，这种痛苦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他说：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有搞到几万吨。我们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才能独立，才能真正避免“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历史悲剧的重演。

三是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建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包围和侵略威胁。如果不发展重工业，国家就不能独立。

经过毛泽东的通俗阐述，使全党明确了为什么要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2. “四马分肥”

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了赎买政策，即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工商界最关心是利润分配问题，也就是资本家在为国家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和自己生产时，自己能获得多少红利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提出了“四马分肥”的分配办法。这一提法既生动形象，又便于理解宣传。

在提出这个办法前，毛泽东曾向大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做过调查，了解到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sup>①</sup>

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毛泽东列了一个“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 20.5%。<sup>②</sup>第二天，周恩来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 25% 上下就更合适一些。后来，大致就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 3. 从“两个万岁”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初步确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依据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2 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2 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合作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思想，确立了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思想。他形象地提出了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来，这一方针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深入浅出的解释、宣传，被广大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所理解认同，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1956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sup>①</sup>“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文献里，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sup>②</sup>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党的八大接受下来，确立为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八字方针”。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对这一方针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

---

<sup>①</sup>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sup>②</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3页。

民的信任”<sup>①</sup>。

所谓互相监督,就是各党派之间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监督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也讲道:一些民主人士继续留在民主党派里面和我们一道合作,有什么不好?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比如民革,它就是跟原国民党出身的、曾经当过政的一些人有联系,不管是上层的、中层的或下层的意见,它都可以听到,而这些正是共产党不大容易听到的。又如民盟,它在知识分子圈里可以听到更多的意见。再如九三学社,联系的科学家比较多;民建主要是联系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民进联系中小学教员方面。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和特点,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工商业者在一起,总是可以把工商业者的心里话多说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可以谈他们心灵深处的话。我也有一些党外朋友,而且过去很熟,我总希望通过他们知道一些不同意见。可是他们到了我面前,就是愿意说,也要保留几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总不免要考虑考虑。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

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分组讨论时,有人提出毛泽东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对此,毛泽东又进一步对“长期共存”进行了阐述。他说,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进行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 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在此后的多次会议和场合,他不断在党内党外阐述着双百方针的意义、内涵,解答着人们思想上、实践上的一些困惑。1957年3月,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动情地谈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的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sup>①</sup>双百方针的提出,不仅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它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种决心和信心,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现在是春天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sup>②</sup>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双百”方针的提出,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回忆当时的情境时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

<sup>①</sup>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sup>②</sup>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492页。

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sup>①</sup>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为了使“双百”方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毛泽东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他先在小范围内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在大会上讲。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首先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在思想领域里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观察思考的基础上，他要在全党、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它、掌握它。于是，2月27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毛泽东向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的第八部分，阐述了“双百”方针。

但是，毛泽东向来不认为，开上一个会议，讲了一篇话，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得以解决，尤其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进一步摸清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建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破例邀请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继续研讨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3月7~13日，毛泽东先后召开五个座谈会，和与会代表悉心交谈。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他边听边议，尽量回答与会者提出的所有问题。比如，

---

<sup>①</sup> 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493页。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现在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怎么办？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以亲切平等的语气、生动形象的语言谈了自己的看法。

通过上述一系列会议，毛泽东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条件下，如何贯彻“双百”方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思想领域里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

第二，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

第三，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第四，我们主张百花齐放，但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种信心。它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

## 第五章 大众为本,教育为先

### ——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化

普及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他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了不同的宣教教育的内容。对于普通的工农群众,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教育,注重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引导、教育他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党员干部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他们不同的文化知识和实际经验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教育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教育;对人民军队则强调革命的纪律、任务等方面的教育;对于知识分子着重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教育。二是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方式。有“高雅”的文化形式,比如,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创办各种报纸杂志等;也有民间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形式,比如,秧歌、戏曲、口号、标语、壁报、墙报、绘画等等。在对人民大众进行分别教育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满足各阶级、阶层人民大众的利益和需求,引导他们逐步认同、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动员他们积极参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第一节 对普通工农群众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普通工农群众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能否把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广大的党员干部是人民大众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首先应该在他们中展开。但是，对普通工农群众和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面临着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如何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命运，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制约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两个难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努力解决这两个难题。

### 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启蒙教育

毛泽东对普通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工农群众的语言和思维，以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二是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训练班，通过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形式，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打下基础。

在这里，我们通过两个事例来说明毛泽东是怎样对工农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

1921年11月，毛泽东来到湖南萍乡境内的安源煤矿，发动工人罢工。他来到工人最集中、环境最恶劣、危险最大的一个采煤掌子面。在这里，毛泽东看见，“煤黑子”们一个个赤身裸体，骨瘦如

柴，身上沾满了煤灰，汗水从头上往下流淌着。毛泽东关切地问一位工人：“你们为什么不穿衣服？”他说：“穿什么衣服，劳工三尺布，又当帽子又当裤。在井下我们用这块布当包头和矿帽，出了井就围在下面当遮羞布。”他们抱怨说，一天干12个小时，才拿8个毫子，还经常挨洋人、把头皮鞭子，是命苦啊！毛泽东启发他们说：“不是命苦，受苦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洋人、把头在剥削我们。”看见工人们对于“剥削”一词非常陌生，就向他们解释：“比方说，你们一个人一天挖30筐煤，卖掉后，洋人、老板和工头把钱拿走了，只给你们不到半筐煤的钱，这就是剥削。他们不劳动，为什么能吃好、穿好呢？就是因为剥削了工人的挖煤钱。”工人们问，我们的命苦能不能改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只要工友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改变命运。他给工人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团结的力量。他说，路上有一颗小石子，老板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到边上去。如果把许多小石子掺进石灰，粘成一块大石头，就会像磐石一样坚固，不要说小老板，就是大老板、洋人，也搬不动了。只要我们捏成团，就比大石头更难对付了。在毛泽东的启发教育下，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破除了迷信，萌动了要斗争、要革命的思想。

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领导农民运动。湖南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剥削。韶山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毛泽东到韶山后首先教育农民正确认识自己所受的苦难。他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不但韶山农民遭受苦难的日子，我到过的全国其他地方也都一样。这些苦难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完全是帝国主义“洋财东”和土豪劣绅相勾结、剥削压迫所致。他用生动的比喻、通俗的语言给农民讲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深入到农民的家里，和他们拉家常，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在和他们拉家常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向他们讲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

黑一年累到头，种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通过这种对比，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

为了改变大多数工人缺少文化知识的状况，进一步破除迷信，毛泽东在安源运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开办了工人夜校，一面教工人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向他们讲解革命的道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区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派出了许多党员、团员干部，深入到工厂、矿山、铁路的产业工人中，大力创办工人夜校。

这种创办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实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好的教育方式。通过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向他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毛泽东亲自到夜校为工人上课。他特别善于联系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实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阐明大道理。为了教育工人不要信命，要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首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很多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工人听了毛泽东生动的讲述，顿时心中明亮，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他不断地鼓励工人们，什么都不怕，只要工友们团结起来，什么天翻地覆的事都能做出来。

夜校的教员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安源工人阶级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课本，以浅显生动的革命道理来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例如《工人读本》，就是其中的一种。当时的《工人读本》里这样写道：

资本家，不做工，  
吃得好，穿得好。  
他们的衣食哪里来？  
劳动者的血与汗。

这样,就使工人懂得了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原来是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结果。

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安源路矿支部成立。安源成为当时党组织聚集和保存干部的堡垒,培养人才的学校。这些显著的成绩,是和毛泽东的组织、教育、引导分不开的。9月,安源路矿全体工人13000多人宣布大罢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们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做主人”的响亮口号。

为了对农民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毛泽东在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时,利用军阀赵恒惕提倡所谓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在毛氏宗祠、李氏宗祠、庞氏宗祠等处,开办二十多所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珠算,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教育。比如,讲到“手”“脚”两个字时,他对农民说,人人都有手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鱼肉,有脚不走路,出门坐轿子,这是大千世界最不合理的,毛泽东用这种通俗的语言和教育形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在中央苏区时期,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使得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自由,从而保障了广大农民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对于儿童,苏维埃政府创办列宁小学,普及义务教育;对于成人,苏维埃政府创办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在苏区各县普及文化教育。以中央苏区为例:有2931所乡中学,3052所列宁小学,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5371人;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sup>①</sup>

群众识字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形成了“子教父,媳教婆”的识字

---

<sup>①</sup> 参见叶春主编《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风尚。苏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很快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在苏区，不分男女老幼，许多人明白《国际歌》的内容，明白《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的内容。许多以前不识字的工农分子，现在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分别能解释。苏区的文化教育活动，为工农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要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的抗战服务。他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sup>①</sup> 张闻天也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在宣传的方针上，提出了利用一切具体事实，宣传抗战中民族英雄们与烈士们的伟大事迹，发扬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奋斗的精神，以造成民族自信心，以击破民族的失败主义；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变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心理；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等。在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向全国人民说话；使我们的话为大众所了解；多采取谦逊的、商讨的、和平的、合于中国民族习性的形式；不要太抽象、太刻板、太偏激，而要生动、活泼、具体，带有充分的科学性与说服力。<sup>②</sup>

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

---

<sup>①</sup>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sup>②</sup>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

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对国民教育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把对工农大众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系列。在教育的内容上“应该确立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在教育的具体形式上规定：“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sup>①</sup>“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以帮助社教的发展，并应指定专人负责。”<sup>②</sup>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党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唤醒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第二，对国民党在抗战中各种不合理的做法加以揭露，尤其是对它的反共政策、妥协阴谋以及危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办法加以揭露，使人民认识到这种办法只能引导中国走向亡国的道路，使工农群众了解到，只有团结抗战才能胜利。第三，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国民教育，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启蒙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开阔政治视野，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文化基础。

## 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运用的教育

由于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所以，毛泽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329页。

<sup>②</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330页。



东提出的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的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井冈山时期，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党支部，因而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各县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严重的地方主义，一个是尖锐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这两个问题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的，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克服这两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有：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尤其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边界各级党组织经常组织党员上党课，办训练班，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逐步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由阶级来划分的，而不是以省、县、区、乡来划分的，也不是以土籍和客籍来划分的，天下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一家，工人农民是一家，土豪劣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我们只能分是哪个阶级；共产党员一定不能陷入地方主义和土客籍对立中，要讲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二，用身边的实事，引导大家来认识土客籍的共同敌人。比如，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还是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让他们在实践中明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道理。

尽管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确实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于1928年11月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详细地汇报了这两个问题。他说：“‘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

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两省的‘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sup>①</sup>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决议深刻地指出了这八种错误的思想表现、危害、根源及纠正的方法。这八种错误就其思想性质来说，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固有表现，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这是因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党长期在农村中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党内以后，所必然带来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党内教育的详细材料和方法。他列了十种学习材料，十五种学习方法。在所列的十种学习材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是其中之一。“方法”也列得非常细致，主要包括：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批评；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等等。从这些史料看，毛泽东对如何进行党内教育问题上，考虑得全面细致，他意识到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而任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泛滥，那就可能会使共产党蜕变成“农民的党”或其他什么阶级的党，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就像过去历代农民战争那样。因此，古田会议提出并开始解决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个重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课题。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郑重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任务。他说：“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sup>①</sup>怎样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呢？毛泽东教育全党“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sup>②</sup>。他认为，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的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中，继续发动全党的学习运动，提出了学习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学习方法等。他首先讲到，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人，现在有几十万人，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要领导革命就必须学习。其次，学习也是为了克服本领恐慌的缺陷。他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他还生动地把这些人比喻为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sup>②</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再次，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就必须学习。因为我们要建设的这个大党，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对于学习运动的可能性，毛泽东针对“没有工夫学”、“看不懂”的论调，开出了两种药方，一个是“挤”，一个是“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怎样学习才能有成效，才能在全党培养起学习马列主义的风气呢？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思路：一是把全党办成一所大学校，叫做“无期大学”、“长期大学”。“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是“延安独创”，只要活着，任何人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是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二是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帮助。现在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今后全党要互相帮助地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再次对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提出具体要求：党、政、军、民、学的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是一种长期大学校；每日二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机关与人员。<sup>①</sup>

在全党发动学习运动，“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成为经常性的永久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历史文化知识的“长期大学”，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为了保障学习的实效性，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

---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作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学习的课程及相关要求：

一 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 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原则，大致规定如左：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

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

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

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sup>①</sup>

“指示”还强调：“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凡不识字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sup>②</sup>

1940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根据上述指示的一般要求，对在职干部进行了分类，并对其教育的内容、时间、方法、经费保证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

一 把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四类：

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sup>②</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

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

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 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

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

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

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

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 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sup>①</sup>

“指示”对学习的时间、学习的形式、经费保障等方面也做了规定：必须保证平均每日两小时，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为了鼓励在职干部的学习积极性，“指示”还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在延安整风时期，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更为集中、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反对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毛泽东认为，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延安干部的教育，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延安集中了全国的人才，“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的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sup>①</sup>因而，延安的整风教育学习运动对全国具有重要的辐射作用，延安的党员干部“三风”问题解决得好，将会影响到全国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影响到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要求各个机关、学校要集中全部精力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不管什么人，都要认真研究这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并写好笔记。“学校两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下这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sup>②</sup>“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sup>③</sup>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在全党彻底打破主观主义的决心。因为主观主义不打倒，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抬头。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从上述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央的文件看,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学习运动到延安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井然有序,各得其所。有内容、有形式,有组织、有实施,有监督检查,有经费保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在全党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氛围,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广大党员干部运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引导周围群众,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集中的阐述。

### 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教育

#### 1. 真正的群众领袖,不是自己封的,是靠群众封的

毛泽东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特别赞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正确选择干部的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他说,我们干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要按着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sup>①</sup>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用极为通俗的语言讲: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来考验。是不是能够紧密地联系群众,也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客观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sup>①</sup>毛泽东用这个通俗的故事说明，一个干部是不是真正的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一个领导干部为群众做了好事，给他们带来了实际的利益，群众自然会认可。他号召党员干部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宣传，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sup>②</sup>

### 2. 共产党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一贯倡导共产党员人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把这一思想形象地表述为：“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接着，他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sup>①</sup>

毛泽东用“不偷、不装、不吹”来教育共产党人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装腔作势,不要文过饰非,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笔者以为,毛泽东讲的“不偷、不装、不吹”还有更深刻的寓意,他揭示了“偷、装、吹”三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偷、装”主要是针对党内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照抄照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1页。

搬、不懂装懂，只会发号施令、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只会用偷来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对待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失灵后，又不懂装懂。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吹”的背后不仅仅是虚报、瞒报，掩盖实情，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人把党给予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把自己分管的区域当作自己的地盘，通过“吹”来显示自己的业绩，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而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人民事业，全党的事业，这实际上就是官僚主义、山头主义的表现。这是我的工作，我说了算；这是我管理的地盘，由我作主。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sup>①</sup>在这里，毛泽东既从党的作风和做人的规范教育共产党人要“不偷、不装、不吹”，又从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高度，教育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这一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3. “天天洗脸，天天扫地”

毛泽东用“天天洗脸，天天扫地”来形容对自己要敢于作自我批评，以防止骄傲自满。“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页。

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sup>①</sup>毛泽东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他经常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sup>②</sup>

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是解决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矛盾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批评的含义,就是“好好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好好说理,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经过反复地充分地说理讨论,让每一个同志从道理上把是非弄清楚。这个过程,既是严肃的、坚持原则、不包含个人情面的,又是诚恳的、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既要求有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采取平心静气,风和细雨的方式,又要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讲面子,彻底解决矛盾。但要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把党内批评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把思想上原则上的对立,用一种打击政策、压迫手段、惩办主义来解决,这样往往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对抗。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而不能变成攻击个人的工具。

#### 四、进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

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活着才有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要工作,为谁而工作,怎样的工作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人生观、价值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观的问题，即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致力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还重视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39年12月，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那种“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为中华民族和人民而献身的“共产主义精神”。<sup>①</sup>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张思德，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三次负伤，当过勤务员、通信员、警卫员，最高职务是班长。1944年9月5日，他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从张思德平凡人生经历中，发现了我们革命战士的伟大，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又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毛泽东抓住这个典型，教育全军、全军，要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毛泽东在演讲的开篇就开宗明义：“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成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接着，他“以死论生”，讲到怎样的生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sup>②</sup>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生命的价值在于“为什么而死”，死亡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但生活的道路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660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是可以选择的。张思德牺牲之后，毛泽东把警卫队长叫到窑洞详细询问情况，严肃地说：“前线打仗，是免不了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产出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党的本质的理论说明，而且也是对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阐明和对革命者思想修养的要求，实际上为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赋予新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sup>①</sup>又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②</sup>当时他们指出这些思想，主要是着眼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着眼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从改造主观世界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看成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要求人们身体力行，这样，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人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的思想，就落实到每一个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中来，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真正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教育，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要求党员干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认识水平，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且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仅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到实处，而且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保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得到贯彻执行。

毛泽东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释了一个共产党人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从毛泽东的文献和著作中我们看到，他是从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指出：

共产党人人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老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胜利的根据。”<sup>①</sup>

共产党人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服务一时，而是服务一生。

共产党人要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她的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产党人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sup>②</sup>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sup>③</sup>

综上所述，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而言，毛泽东给予的定位是：“儿子”、“教师”、“勤务员”、“普通一员”、“朋友”。是“儿子”就不能离开人民群众母亲的怀抱；是“教师”就要担负起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使命；是“勤务员”就要为人民群众这个主人服好务；是“普通一员”，就不能搞特殊，不能高高在上，自以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③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是；是“朋友”，就要诚心诚意地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正是基于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这种关系，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就要热爱人民，就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就要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的生产、利益、情绪。党和政府制定政策，就要向人民负责，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适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 第二节 对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何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理，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建立一支人民的武装。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sup>①</sup>毛泽东一直殚精竭虑为缔造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革命军队而努力。本节主要侧重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军理论，结合中国军队的特点，对军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提出：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871年，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及时总结这次武装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强调：“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队的基本理论主要有：（1）军队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故军队不是“超阶级”的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抽象物，而是属于服从于一定国家和阶级的暴力工具。(2)物质和精神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两个重要因素。认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基础，战争双方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掌握较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方能战胜落后的一方。然而，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对国家和军队的民心士气和精神因素又有决定性的影响。“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3)资产阶级的常备军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手段，无产阶级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军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列宁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队理论。他明确提出：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他在亲自领导创建苏联红军的过程中强调：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必须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他在建军实践中所提出和创造的主要理论有：(1)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2)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军队的领导，认为只有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才能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使军队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3)无产阶级军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列宁把纪律视为无产阶级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认为纪律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而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4)必须把军队建设引向正规化和现代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对毛泽东领导革命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 二、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官兵一致”的教育

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认为，必须在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1927年9月，他在三湾改编时，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后来对

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连队是部队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基层单位，只能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才能牢牢掌握士兵，才能使连队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后来，毛泽东总结经验时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sup>①</sup>三湾改编时，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专门负责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并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就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强调，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经过会后对红军的教育，肃清了旧式军队影响，使党对红四军的领导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长征途中，经过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使党对红军的领导达到了高度统一。后来，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农民革命战争和中国现代自孙中山领导革命以来各党派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总结，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有军则有权”的真理，教育共产党员不应争个人兵权，但必须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民族的兵权，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重新强调了加强军队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国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工作，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概括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有绝对领导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军队只能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绝不能成为任何个人反对党或凌驾于党之上的军事工具。

毛泽东认为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封建压迫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化管理制度，即在军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上下一致。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军队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政治上一律平等，生活上互相关心，同甘共苦。使每一个官兵都认识到，大家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而又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兵一致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比如，在军阀的军队里，官兵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军官穿戴很讲究，有所谓“三金主义”、“五皮宪法”。“三金”是金丝眼镜、金戒指、金牙；“五皮”是皮鞋、皮绑腿、皮带子、皮包、皮鞭子。官长过着腐化的生活，有专设的小厨房，可以赌钱打牌，还可以讨小老婆。而士兵每月几块钱的饷还发不到手，还要被官长拳打脚踢。这就是说，军阀军队里的官兵关系，完全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而官兵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深刻地总结道：

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着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sup>①</sup>

### 三、进行执行“三大任务”的教育

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军队，其任务只有一项，就是带兵打仗。而毛泽东所缔造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不但会打仗消灭敌人，而且还会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群众工作，还会进行生产劳动，从事经济工作。他们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还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这是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严格区别，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打仗的军队同时塑造成会做群众工作的军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队、劳动的军队，并不断致力于“三大任务”的教育与实践？

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当时的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军队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列宁则在此理论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毛泽东根据这些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建军之日起就强调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人民军队不能脱离人民，要依靠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为了人民去打仗，这就需要军队学会做群众工作和生产工作。

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看，中国人民面临着双重压迫，敌人异常强大，如果不组织、武装群众，解决生产自救的问题，这支军队就不可能完成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人民军队通过宣传和组织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使群众不但在政治上彻底得到解放，而且在经济上直接得到利益。同时，通过群众工作，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直接支持革命战争，以保证我军战斗队任务的实现。

从实践上看，这是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了茶陵县城。由于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进占县城后，既不发动群众，也不打土豪筹款子，而整天蹲在县城里吃吃喝喝。带兵依然沿用旧式军队的方法，每天站岗放哨，“三操、两讲、两点名”，部队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然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开堂审案，收税完粮，因而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不久，当茶陵遭到反攻时，团长、副团长等发生严重动摇，企图叛变投敌。毛泽东采取及时措施，处决了团长陈浩等人。这件事给毛泽东很大的触动，他及时召集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了茶陵期间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有历史以

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它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旧式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决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去打仗的。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意义。

因此，他向工农军郑重提出了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专门打仗的。现在，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人民军队提出三大任务，这对于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的三大任务，就意味着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就和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政治的旧式军队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列举了这种观点的八种表现及形成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军官等。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打土豪筹款子”的任务演变成了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当时对军队执行生产任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提高了战斗力，而且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因能够扩大军队；同时，还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纪

律性,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等。1949年初,毛泽东又根据我军战斗性的任务逐步减少,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等任务的需要,及时提出,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变为工作队。他说:“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sup>①</sup>他还提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的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sup>②</sup>。

这样,毛泽东提出的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任务,即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毛泽东是用什么的思想 and 政策去指导人民军队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工作呢?毫无疑问,是他不断在军队中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党的具体政策。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这支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这样才使军队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井冈山根据地,弱小的红军依靠人民群众筑起和铜墙铁壁,打破了强大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在抗日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诸如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作战形式,真正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解放战争中,仅淮海战役就有民工 543 万人支援前线。其中随军常备民工 22 万人,二线转运民工 130 万人,后方临时民工 390 万人。他们用肩挑、车推、驴驮、航运等方法,从千里内外将大量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推进,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6 页。

所以，“三队”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军队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三种形式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及其实践，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架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桥梁。

### 四、进行严明的组织纪律教育

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必然有钢铁般的纪律。毛泽东历来重视加强军队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他不但注重纪律的制度建设，还注重纪律监督实施，认为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思想教育。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纪律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队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之师，文明之师

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一直注意工农革命军的群众纪律问题。由于环境艰苦，再加上旧军队作风的影响，部队不断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像随便吃老百姓的红薯、鸡蛋，甚至乱拿打土豪缴来的东西等等。根据部队中存在的这些违纪现象，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1927年10月，在部队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又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及时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这六项注意是：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修改和完善。1928年4月，毛泽东将“六项注意”的内容又增加了两项：“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的腰包”。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使全体指战员能

更好地熟悉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在红军时期就已经谱成歌曲，在部队中广为流传，遂成为部队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内容修改，补充完善，并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重新颁发，要求全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固定下来。

我们今天从这些纪律的条文看，似乎都是些平常的“小事”，是生活的细节问题，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但深入研究它的本质，却发现这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体现了部队在处理党群关系、党军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上的基本要求。我们这支部队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农村艰苦、分散的环境中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战斗，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如果不去彻底革除旧军队的习气、作风，一个个由农民组成的士兵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党领导下的具有无产阶级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处理不好党群众关系、党军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军内的官兵关系，人民军队就不可能从三湾改编后的700人左右发展壮大到1949年初的200多万人，更不可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对于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不仅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还严密注意部队的执行情况，并经常搜集典型事例，不断对指战员进行教



育。例如，1928年8月，红军在回师井冈山途中，因为饥饿，把农民一块地里的玉米吃光了。毛泽东知道后，就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在现地向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后来，在长期执行纪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比如，在部队特地成立了“群众纪律检查组”，专门负责检查部队群众纪律的情况，如发现问题立即作出处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颁布和执行，生动地反映了新型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一切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深刻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 2. 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强化对军队的纪律教育

革命的环境在不断变化着，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习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转变的，所以，纪律的贯彻执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革命的征程中，毛泽东不断根据实际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提出不同要求，对军队的纪律教育始终不放松。1946年7月，在解放战争开始之时，毛泽东根据部队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时提醒部队首长，注意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他指出：“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近来仍有部分部队，由于事先忘记进行此项教育，或在进行此项教育时未采取认真的严肃的态度，或以为过去进行过此项教育，在新的行动时不必再做，或仅使少数人知道，未能由部队首长举行全体讲话，以致在进入城市时发生破坏纪律之事，实属不好。望各部队首长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一切部队的纪律教育，是为至要。”<sup>①</sup>在解放第一座工业重镇石家庄前，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指挥这次战役的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具体规定民兵不入城、野战军不住城。此外,中央军委还批转东北野战军人城纪律守则,一切入城的干部不得自由夺取物资,不准制新衣,不准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工作作风。

1948年1月,我军在攻克高家堡后,没收了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发生了破坏纪律的事件。对此,毛泽东及时在叶仲勋打来报告上批示道:“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sup>①</sup>195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他要求志愿军必须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指出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认为,纪律要靠经常性的教育和养成,如果这种教育几个月不搞,军队就会松散。正是毛泽东对军队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纪律教育,才使我军成为遵守与执行纪律的模范之师。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赞扬了军队严格遵守纪律的优秀品质。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sup>②</sup>

---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 第三节 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一向认为，知识分子是革命和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立场和行为方式必然具有阶级的局限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因此，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就不能像对工农群众、党员干部那样，直接“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能靠自身的“言传身教”去吸引、接纳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正确的政策、纲领和为民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精神，靠着真诚的说服、教育、改造、帮助，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人心，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党走决心。知识分子从同情、支持革命到认同、接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文化战线上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性、策略性和渐进性。

#### 一、努力把知识分子培养成一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队伍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政策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在文化政策上提出了苏维埃政府要吸收、接纳知识分子的规定。在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

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sup>①</sup>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先后写信给文化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称“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sup>②</sup> 1936年11月,毛泽东在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要从“文”的方面进行对敌斗争。他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现在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要停止内战。但是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我们要从文的方面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从“武”、“文”两个方面进行对敌斗争,而且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要进行抗日的文化宣传斗争。

1939年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明确强调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说:我们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

---

<sup>①</sup>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9页。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sup>①</sup>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根据地一部分军队干部对知识分子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阐述：“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他提出今后要特别注意，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使之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我们要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5天后，即1939年12月6日，军委就发出了《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指出要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对已经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要好好的给以教育和率领，善意的纠正其弱点，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对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应当适时加以提拔，不应长久的令其当文化教员和干

---

<sup>①</sup>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事。”<sup>①</sup>对于有政治嫌疑的分子，最好的办法是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后，无问题时则应加以信任，有问题时则加以洗刷。这个指示还强调了工农干部的教育问题，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努力使自己知识分子化。指示强调：“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而且不识字和无知识便不能成为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好的干部。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sup>②</sup>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两篇文献表明，党把知识分子不仅当成了统战的对象，抗日文化的队伍，而且把他们作为党的军队发展、革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我们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同等地对待，他们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工农干部需要实现知识分子化，而知识分子需要实现工农群众化。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一个重大变化，他已经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毛泽东随后的两篇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更加明确的阐述。

## 二、教育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党组织进行了积极有效的争取工作，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仅西安转介至延安的青年就有两万人左右。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sup>②</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抗日根据地，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提倡和学习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碍创作情绪”，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轻视工农，脱离实际，对火热的抗战漠不关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语言不懂，也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而比较多地把兴趣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分子上面。在新的形势下，文化工作者应遵循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式，文化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如何实现这个结合呢？毛泽东认为要向两个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sup>①</sup>怎样实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先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在思想上要破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相结合。文艺界要整风学习，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

毛泽东还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一是只要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而抹杀了革命性。认为只要艺术水平高的作品就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426页。

是好作品,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二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性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毛泽东认为,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不能“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就是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说是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sup>①</sup>

那么,文艺工作者如何把握革命性与艺术性的问题呢?毛泽东提出了革命性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能讲抗日,讲民主、讲马克思主义他就不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需要民主,但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是不来的。小资产阶级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讲艺术性,也是从

---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低级到高级，即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见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sup>①</sup>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的主要基础是工农兵，要下决心工农化，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

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我们的同志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毛泽东强调，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重视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别具一格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打响了第一炮。毛泽东看了不仅连连点头，表示满意，还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样子！”他问朱德：“你觉得怎样？”朱德称赞说：“不错，今年的东西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密切结合现在的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中央党校的杨绍萱写成了剧本《逼上梁山》，1943年12月20日，该剧首次公演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共七大代表的热烈欢迎，并被评价为是京剧改革中大有成绩的一部作品。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就此写信给杨绍萱、齐燕铭，称赞他们在改造戏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使旧剧开了新局面，希望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将《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编成平剧上演,经多方征求意见,确定的主题是:“一打”是调查研究;“二打”是“各个击破”,分化敌人;“三打”是里应外合,攻克堡垒。1945年,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在延安公演,演出获得成功,在边区反响强烈。毛泽东看过戏后,写信祝贺延安平剧研究院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有教育意义。”继《兄妹开荒》后,戏剧、诗歌、文学等各个文艺领域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迎来了延安文艺的繁荣期。与此同时,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俱乐部,成立了业余剧团,开展生动活泼的文艺宣传活动,尤其是秧歌剧、新旧梆子、花鼓戏、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大量地应用到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 三、不能强迫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56年1月,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广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时间,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世界观根本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提出,为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给知识分子提出希望:知识分子在自己各项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期间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他认为在知识分子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sup>①</sup>“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sup>②</sup>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现实的，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在这里，毛泽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方法论的指导，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克服旧的和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思维方法。

但是知识分子要真正实现世界观的转变，还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因此，毛泽东再次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利用各种机会接受工农群众。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看好。另一些人可以在那里住几个月，调查研究，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两年、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叫做“安家落户”。“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sup>①</sup>

#### 第四节 宣传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宣传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形式,由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宣传教育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也必然是多样的。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根据不同阶级、阶层人民大众的需要,创办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多种宣传教育方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得到普及。

##### 一、适应大众需要,创建多种学习宣传教育形式

在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都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这是按阶级来划分的。如果按照他们在革命中的实际身份或角色来划分,又可分为军人、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的工农群众、民族工商业者等,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政治理想、政治态度、政治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这就决定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也不同。这里的关键是,宣传教育的形式必须适应不同层次人民大众的需要,而且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探索出多种宣传教育方式,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 1. 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训练班、党校等,在党员干部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 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到成为党的领袖，他一直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视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最早在根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开办红军教导队、干部训练班等在干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办了各类党员干部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训练班课程内容主要是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毛泽东亲自为他们上政治课，讲授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讲课时就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要组织穷人起来打天下的”，“除了讲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纲领外，对共产主义也作了一些通俗的解释，指明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为了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1933年3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瑞金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1937年1月，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成为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1940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几种党校和训练班，以训练中级、区级和初级干部，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在教学方面，提出了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能切实懂得之目的。在这个指示前后，中央书记处连续颁发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1940年2月18日）、《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

年3月18日)、《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等,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用的学习。中央党校和各级地方党校,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全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通过举办工农夜校、学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墙报等教育形式,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在群众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随着根据地红军的壮大和区域的扩展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增强他们对革命的信心及帮助他们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便摆上议事日程。为此,毛泽东强调,“每个红军都是组织员、宣传员、战斗员”。《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规定:“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提纲,加强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毛泽东强调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要学会使用群众的语言,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来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和特委、边界政府的重视下,各县纷纷提出了开办列宁小学、平民小学、红色小学的要求。1927年底至1928年秋,仅宁冈县就办起了12所红色小学,有学生800余人。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各学校的教材无法统一,但教材内容的共性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思想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地的夜校和半日学校是在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群众自己创办起来的,几乎每个村都有。任务是以识字为主,并在识字教学中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为儿童创办了列宁小学,为成人创办了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等,对群众进行扫盲等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据《红色中华》报道:“1932年8、9月,江西胜利、兴国等14县夜校3298所,学生52292人,识字小组

19812组，识字组员 87916人，识字委员会 2744人，俱乐部 712个。”<sup>①</sup>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长冈的文化运动。他指出：长冈乡有“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夜校“全乡九个”，“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全乡十六至四十五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校，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校顶好’。”<sup>②</sup>被编入识字班的是那些有“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人。“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sup>③</sup>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谈到了才溪乡的办学情况。他写道：上才溪：日学，四个，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夜学，四个，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墙报，四处。下才溪：日学，五个；夜学，八个；俱乐部一个；识字班二十六组；墙报，五处；读报团，一处。<sup>④</sup>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苏区文化的繁荣，而且把文化建设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据 1934 年 3 月印发的《消灭文盲协会新章程》载：“苏维埃革命进展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工农干部，三五年前一个字不识的人，现在能够看文件，能够在县区苏维埃负责工作，甚至省苏维埃也有这样的同志了。”

抗战时期，各级各类的文化教育形式和活动开展起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学校就有十几种。1939 年 6 月 10 日、13 日毛泽

① 叶春主编：《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7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8～309 页。

④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0～342 页。

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中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小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sup>①</sup>1940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颁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对党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内容、形式又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学校教育方面,强调尽可能地恢复与重新建立各地小学校,达到每村有一个初级小学校,每乡(或每编村)有一个中心小学校或模范初级小学,每个中心区有一个两级小学或完全小学,以建立广泛的小学网。在社会教育方面,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等,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在国民教育的内容上,强调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教育。

总之,在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通过举办各种学校,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在对民众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把马列主义理论化为党的方针政策,输送到广大民众之中,在人民群众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 3. 通过创办各种报纸、刊物、通俗读物,广泛宣传、介绍马克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与运用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时期，创办了党内刊物《特委通讯》。《特委通讯》就经常把一些带有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刊载其中，用于指导各县县委工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提出要用党报、政治简报、各种小册子对干部进行教育。1929年下半年后，前委、红四军军委还创办了《赤报》、《政治简报》和《捷报》等，利用这些党内刊物教育干部，从而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能力。

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斗争》、《红色中华》、《火线》、《中华苏维埃报》等报纸杂志 16 种，不时刊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译介文章，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全译文都是在苏区报刊上与中国读者首次见面。在马克思逝世 50 周年等重大纪念日中，这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社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

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建设中发现，群众的信息不灵，见闻狭隘，思想保守，严重制约了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热情，“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在群众中大量存在着。“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sup>①</sup>要打破群众的这种保守观念，引导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推动群众不断扩大新的区域，毛泽东认为举办《时事简报》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为此，1931年3月，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决定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由于这份简报的读者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士兵和群众，所

---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以简报的内容设计和编写方法必须与他们的阅读水平、思想状况、利益需求相适应。我们从毛泽东书写的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在如何使简报适应群众的需要,引导群众的看报兴趣,使之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成为真正的群众读物等方面进行了深思熟虑,下了很大的工夫。毛泽东为《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1.《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

2.《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混战等等)。

3.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

4.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

5.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6.《时事简报》的材料,关于本地的和近地的,那就很容易采取;关于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政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

7.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

8.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不能靠扯谎吃饭。

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

方可以一天出一张。<sup>①</sup>

另外，在编辑办法、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新闻消息的内容要求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在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上，毛泽东强调了本土化，本地的新闻要占多数。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只要和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群众一定喜欢看。《时事简报》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他说，那些印刷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实际上只有干事看得懂，许多下层的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时事简报》要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从毛泽东怎样办《时事简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宣传教育思想的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教育的内容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国内到国外；宣传教育的方法，通俗化、本土化、民族化。这些思想和方法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更加完善，成为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重视利用报刊来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从中央局起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和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成为自己的中心任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时，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sup>①</sup>在宣传的内容上，提出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有65种，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47种，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122种。中共在“国统区”还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25日起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它成为中共在重庆的喉舌。《新华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提供了有力阵地，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治，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4. 利用歌咏、戏曲、口号、书画、秧歌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针对人民大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毛泽东大力倡导和推动运用歌咏、戏曲、口号、书画、秧歌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教育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他认为，不识字的士兵和群众，他们看不懂书报，但是却能看得懂戏曲、秧歌，听得懂歌曲、口号，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民间的艺术文化，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启蒙教育。

1925年5月，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五卅惨案”，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韶山地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雪耻会”，并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韶山党支部提出了“打倒列强，洗雪国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发动教师、学生和农民专门组织了宣传队、讲演队，分别到各个集镇或村庄去讲演、演戏、散发传单、贴标语、绘漫画等，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当时在一张《雪耻会宣言》的传单中曾这样明白通俗地写道：

好不好真不好，洋人杀到眼前了。  
讲起此事真伤心，大家听我说分明。  
东方有个日本国，想必人人都晓得。  
自从乙丑四月底，青岛纱厂罢工起。  
日本鬼子真凶横，杀死工人顾正红。  
上海同胞都不服，游行演讲个个哭。  
英国巡捕没良心，拿起枪炮就打人。  
死死伤伤有几百，这样蛮横还了得。  
内中有的商人，多是工农和学生。  
英日美法四国人，道理不讲专逞凶。  
此事交涉未解决，汉口英人又猖獗。  
复杀同胞百余人，你看伤心不伤心。  
大马路上血如海，好比牛马遭屠宰。  
青岛上海和广东，处处杀死中国人。  
同胞被杀心里痛，各省各县各乡镇。  
工农商人与学生，报仇雪耻一条心。<sup>①</sup>

通过这种通俗的语言，动员工农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

<sup>①</sup> 转引自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到处都有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标语和绘制的宣传画，比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标语，反映了共产党的性质及当时毛泽东重建边界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等标语则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此外，根据地军民充分发挥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在墙壁上绘制了一幅幅宣传画。其中典型的宣传画有《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挣断枷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这些宣传画在根据地军民中产生了深刻反响，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在中央苏区，1931年底就成立了“八一剧团”，1932年9月改为“工农剧社”。为了培养戏剧人才，1933年4月，成立了“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1934年3月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和“高尔基戏剧学校”。戏校培养了学员1000多人，编成60个戏剧队分别赴各地演出，为苏维埃戏剧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在戏剧创作方面，一批优秀作品，如《我——红军》、《我们的队伍来了》、《女英雄》等先后问世，还出版了戏剧专集《号炮集》。各级苏维埃剧团带着这些反映军民火热战斗生活的剧目经常深入到工农和红军中去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对于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巨大成绩，毛泽东作了充分肯定，他欣慰地指出：“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的一切可能的帮助。”

## 二、建立研究机构，出版各种书籍报纸杂志

1. 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有组织地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毛泽东不仅带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而且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马克思主义专门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建了第一所专门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兼任院长。马列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教育干部，注重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训练，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学会运用这些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学员们一般都经过抗大、陕公、安吴青训班、中组部训练班、中央党校的初步训练后，考试入学的，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党校教员都是延安第一流的理论家，如王学文、艾思奇、吴亮平、杨松、陈昌浩等。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在教学和研究中，学院强调坚持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政治路线的一致，重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著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院授课或作专题讲演。马列学院学员的学习是开放的、民主的，学校不但要求学员读书，而且规定学员必须看报，要时刻注意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化。当时的马列学院图书馆不但收藏了相当丰富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文原版著作），而且还保存了一批党的珍贵历史文献，如，从中共一大到六大的历史次代表大会宣言、决议或党章，几次重要的中共中央或紧急会议的决议，《向导》、《斗争》等党报党刊，还收藏了各种不同政治派别、政治观点的报纸、杂志，如边区出版的各种报刊，国统区出版的各种报刊，俄文版的《真理报》和《科学与生活》等。这些书籍、报刊供学员自由阅读。据统计，到1941年，马列学院图书馆藏书已有六七千种，三万余册。马列学院从1938年5月

开办起到 1941 年 5 月,共招收过 5 个班即 5 期学员,加上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代表专门开设的两个班 100 多人,前后共招收学员约八九百人。1941 年 5 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 月,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作为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应用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构。1943 年 5 月,研究院并入中共中央党校,为该校的第三部。通过学习和研究,学员们受到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情况,对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原军事学院政委段苏权在《一生奋进总思源》一文中写道:在我一生中,真正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入学一年零一个月中,我共读了 34 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另外还有几部苏联小说。……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为我今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都起了骨干作用。

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中央还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如中央机关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和教员组织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党建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等。还有延安新哲学学会,《资本论》小组等众多的理论研究机构及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会等科研单位。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研究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为深刻和透彻,从而带动了全党形成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气氛,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 出版报纸书籍,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问题学习和



研究的广度，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之中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党组建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和马列主义著作编译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群众报》、《关中报》、《前进报》等二十多种报纸，《解放周刊》、《延市通讯》、《边区民政》、《今日新闻》、《群众生活》、《大众文艺》、《部队生活》等四十多种杂志。其中，《解放日报》和《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这些报刊有计划地刊登和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和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其最高发行量 7600 份，发行范围 30 公里，党政军领导人通讯员的直接领取、新华书店办理的外埠邮购、“卖报员”的定点叫卖零售是《解放日报》的主要发行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在根据地各组织系统内的传输和贯彻，延伸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区域、扩大其影响的社会空间，还丰富和方便了基层群众获取毛泽东思想相关信息的渠道。同时，党中央还提出了构建《解放日报》、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新闻事业和传播体系，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编译室，还翻译了一些主要的马恩著作，出版了一套《马恩丛书》，接着又翻译了《列宁选集》20 卷和其他一些马列著作。这些书籍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工运、军事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全党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的高涨。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下，中共在“国统区”也出版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传播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大量译介性和阐释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大都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读书月报》、《中苏文化》等报刊上，作者有章汉夫、胡绳、潘梓年、吴敏等。这类文章主要有：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法则及其运用》
- 《论辩证法法则与方法》
-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
- 《继续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哲学问题》
-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政治》
- 《列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所揭示的“政治逻辑”》
-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 《关于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同一问题》
- 《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
-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之发展》
- 《列宁和斯大林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列宁的哲学笔记》
- 《马克思与中国》
- 《列宁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
-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

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费尔巴哈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选集》第3、5、7、8、9、10、12、13卷，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中译本出版发行，但其中不少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禁止。毛泽东在所著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政治军事论著，和艾思奇在战前所写的《大众哲学》一书，也在重庆传播。这些书籍虽然遭到国民党的禁止，但由于中共人士的努力，其实是查不胜查，屡禁不止。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理论在国统区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空间。

3. 重新发表“两论”，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

更伟大、更艰苦。为了迎接新的长征和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前夕，审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目。它们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员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12本书由解放社在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一年时间里全部出齐，共印了300万册，它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教材。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习、传播、教育、研究提供了空前未有的优越条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组织和推动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毛泽东修改补充了他在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并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1952年3月毛泽东的另一篇哲学著作《矛盾论》也在修改补充后重新发表。由于“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中国人民刚刚过去的亲身经历的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因此，中国人民感到特别亲切。于是，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学习“两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李达为“两论”作了解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51年2月，《实践论》重新发表不久，李达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文，接着，他写的《实践论解说》在《新建设》杂志上分四次连载，并撰写了《怎样学习实践论？》等文章。《矛盾论》重新发表后，他又写了《矛盾论解说》，分七次刊载在《新建设》杂志上，并在《新武大》第99期上发表了《怎样学习矛盾论》的文章，还向武汉市高校教师作了关于怎样学习《矛盾论》的报告。

李达以通俗的形式，浅显易懂的语言，全面、系统、准确地解释了《实践论》、《矛盾论》的思想，用丰富的例证，从不同的角度，多方

面地解释了《实践论》、《矛盾论》的观点；还在学术上提出了与毛泽东不一样的看法。毛泽东对李达的著作给予高度评价。1951年在致李达的信中对其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sup>①</sup>。在信中，毛泽东还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sup>②</sup>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又一封信中再一次肯定，李达的文章通俗易懂。他在信中还说：“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sup>③</sup>李达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为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两论”学习告一段落后，1955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更为深入的唯物主义思想教育。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布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按照中共中央当时的估计，全国各系统中有阅读能力的干部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如果要使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超过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可能需要8年时间。后来随着各级党校与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7页。

政治夜校的普遍建立，这个时间被大大缩短了。事实上只用了5年时间，全党有阅读能力的高、中、初级干部都经过了一番轮训。通过这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建国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表现是，马恩列斯的一些经典著作得到系统的翻译出版。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出版；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又付梓问世；另外，这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应属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等。与此同时，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相继出版。1950年出版了《列宁文选》（两卷集）；1955~1956年底出版了《列宁全集》第1卷、第28卷、第29卷；另外还有一些单行本。斯大林的著作，到1956年底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2、8、9、10、3、11、12、4、6、13卷（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单行本则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论语言学底几个问题》、《列宁主义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对建国初期学习马列主义热潮的形成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触动更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真正成为他们改造思想的重要武器。许多知识分子第一次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走向新生，同时，使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不过，这次大规模的学习教育运动，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了简单化、概念化、教条化的缺点，在学习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的问题上，也有一些过左的倾向。比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加分析地加以抹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有些干部也有简单粗暴的缺点，对苏联的教科书照抄照搬等等。

## 第六章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围绕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理论成果和历史经验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 第一节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 一、大众化的关键: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让这个理论走到人民群众当中,用这一理论解决人民群众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的问题,使人民群众从思想感情上确实感觉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来认识和改造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毛泽东首先从文化或文艺领域入手,提出文化或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使人民群众从内心感情上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他说，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在这里，毛泽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了解群众和研究群众。就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语言习惯，研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所接受教育的方式方法，一句话，要使党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

怎样才能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要认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他们被看作下等人、乡巴佬、穷棒子等，他们被歧视、被鄙视、被轻视，统治阶级除了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之外，就是嘲弄他们，侮辱他们。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严重压抑和摧残。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真正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尊重他们、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等观点。因此，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就是要有正确的群众观，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毛泽东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实现对工农群众感情的变化。他说，自己是个学生的时候，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不愿穿工人农民的衣服，以为是脏的。后来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他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他，才改变了对工农的感情。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党的干部、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只有熟悉群众、了解群众，才能对工农群众充满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兴趣，要把百姓视

为可敬的先生，自己甘当小学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调查研究，通过调研，一方面掌握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正确的决策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又了解到群众的疾苦和需要，增进了与群众的情感，这样就很容易与群众的思想产生共鸣。

其次，必须学会使用群众的语言。“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是沟通思想、凝聚力量、增进理解、化解矛盾的媒介和桥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系统的革命理论，要发挥作用必须采取合适的语言形式，让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因为，对一般人民大众来说，大家不可能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党的理论和文艺工作者努力探索适当语言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嫁接。使用群众语言，是指一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认同，尤其是能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方式。“群众语言”更趋于大众化、口语化，通俗易懂，它更能表现出一定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毛泽东强调，和群众交谈，一定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切不可故弄玄虚，高深莫测，或冠冕堂皇，不着边际。群众最厌烦的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他说，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所以，“群众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少一些“官腔”，多一些“民味”。毛泽东提倡，和群众讲话，要有人情味。以“拉家常”、开座谈会的方式，关心、了解群众，摸透、摸清群众的所思、所虑、所求，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情绪和心境。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要能够反映群众的心声，想其所想，急其所急，能够真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去，这才是为群众所欢迎的群众语言。要学会讲“群众语言”，必须到基层和实践中去学习。基层和实践是群众语言最活跃的课堂，也是群众语言最集中的场所。在群众中的时间长了，耳濡目染，脑子里装进的群众语言就会丰富起来。如躲在深宅大院里是学不到真正的群众语言的。语言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交流时既要让群众听懂宣传教育者、文艺工作者的语言，宣传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更要



听懂群众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话”。做宣传教育工作的人还必须注重搜集掌握一些地方的“方言”、“土话”,从心灵上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更好地贴近群众、走进群众和读懂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

再次,要了解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在旧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生活极端困苦,观念封闭保守,文化水平很低,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之在思想上、情感上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呢?这就需要找到这一理论与群众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马克思主义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农民最关心的是能否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工人最关心的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收入;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提高收入;民族工商业者关心的是减轻税收,增加利润。另外,人民大众的各阶级、阶层还都有不同的文化精神需求。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能够体现和满足人民大众利益需求的各项政策,使这些政策深入人心,人民大众才能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会有自觉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只有抓住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找到了与人民群众沟通、“对话”的语言,满足了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需求,才能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产生共鸣,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

### 二、大众化的宣传教育:研究接受对象的不同需求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需求是指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需的客观条件的反应。需求是人的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人的动机、意志、兴趣和情感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都是围绕这人的自身需求展开的。因此,抓住了人民大众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需求,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问

题所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文化程度,生活阅历,需求的动机、兴趣等不同,人民大众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需求上存在很大差异性,这就要求党的理论或文艺工作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根据需求的不同采取适宜的宣传教育办法。

那么,针对大众的不同需求,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宣传教育呢?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sup>①</sup>毛泽东举例说明了文艺工作者的对象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日根据地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抗战后的国统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是以这些人为主。在抗日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在根据地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他们做好工作。<sup>②</sup>在这里,毛泽东深刻阐述了要面向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必须研究宣传对象的思想实际,认为这是宣传活动取得预期成效的关键。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了解传播对象的特点。眼睛向下,走进群众的心里,体察群众的需要,虚心向群众请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才能真正做到让群众欢迎,收到效果。毛泽东除了认为了解群众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之处,他还认为,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9~850页。

针对性宣传动员群众,才能有的放矢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内化于群众。毛泽东说:“‘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sup>①</sup>那中国的人民大众有什么特点呢?由于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老百姓文化知识水平很低,生活非常贫穷,朴素的通过革命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很强烈。所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是要启发群众觉悟,激发民众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并争取革命胜利。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切实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思想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满足群众的需要,加强传播的针对性。

其次,根据人民大众的特点和不同需求,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很好的借鉴。毛泽东主要从宣传的内容、宣传的语言、宣传的形式这样三个方面强调宣传的通俗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是宣传的内容要简单浅显才易于普及。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更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二是宣传语言还要避免枯燥无味。“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现在我们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6页。

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sup>①</sup>对于这样的宣传家，毛泽东谈道，“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用宣传家”，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sup>②</sup>毛泽东认为，宣传要能够起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情的效果，在人们轻松愉快的心境环境里，在人们自发的笑声和掌声里，完成马克思主义传递的过程。三是宣传的形式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③</sup>

可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认真研究了人民大众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需求，明确了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需求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才能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提高了人民群众整体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理论支持，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

### 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从内容上说它博大精深，从形式上说无论逻辑思维还是语言文字都深深打上西方的印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的问题。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尤其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用中国的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很好地反映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首先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得到创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化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又在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这当中,毛泽东是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人。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方法论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用“实事求是”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可以说,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深的内涵和中国人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语言和思维障碍问题。毛泽东并且用这一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二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这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理论,提出“以苏为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等等。三是由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这方面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原因、条件和内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等等。关于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包括,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合作化再机械化思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等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学说等等。四是围绕上述理论形成的相关其他理论,如关于革命军队和军事战略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

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等。这些理论和方法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它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理论本身是苍白的，理论必须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必须走进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定要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为群众所接受，这就要走大众化的道路。领袖的理论创新必须与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实践结合起来。怎样实现这种结合呢？

首先，调动民众的力量，利用民众的聪明才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党的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的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依靠的是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比如，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了三项任务，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人民军队通过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群众、帮助群众的工作实践，通过与人民群众共同的生产自救活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他要求广大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在工农中汲取养料，同时，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灌输”到工农中去。他还提出党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积极在工人、农民中创办了夜校、识字班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为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打下基础。

其次，运用人民群众喜爱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针对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和实际的思想状况、文化水平等，采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人民大众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比如，针对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知识分子

等,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办报纸、刊物、杂志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针对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众,采用办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等方式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文化素质,还通过民间大众化的文化活动,如秧歌、歌曲、戏曲、口号、标语、壁报、墙报、绘画、诉苦等形式,来从情感上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

再次,按照从党内到党外,从根据地内到根据地外、从部分地区到全国范围的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到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从上世纪30年代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的经验神圣化,到中国革命遇到重大的曲折,从毛泽东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革命得到转折,到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是同步的。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积极推动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逐步从党内到党外,从根据地内到根据地外,从党执政的部分地区到党执掌全国政权的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注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1938年后,毛泽东在全党发起的学习运动、党的延安整风运动,都是由内到外对工农兵进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应用的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倡导支持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目的也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毛泽东把党的理论创新同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实践结合起来,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四、大众化的根本所在:人民大众利益的实现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本

质属性决定了它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并且在这场运动中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实质上就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根本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所解决的人民大众问题、满足的大众需求、体现的大众思维、运用的大众语言、提供的大众产品,都是大众立场、大众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关键就在于这一理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使人民的利益愿望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①</sup>,列宁曾提出,工农兵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更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等等。历史已经证明,忽视人民的理论必然被人民所忽视,轻视人民的理论也必然被人民所轻视,蔑视人民的理论只能被人民所蔑视。只有重视人民的思想理论才能被人民所重视,才能转化为人民群众真正的思想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不断“化大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重视人民大众、关心人民大众、服务人民大众,从而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的过程。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那么,在工作中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要,使人民群众愿意也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需要去做很多相关的实际工作。

首先,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调查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基本的科学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各种材料,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思考、分析、论证,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目的,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并把这一科学方法和解决人民群众利益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指出:“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sup>①</sup>

其次,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否则任何空洞的说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了解情况,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只有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才能让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他们服务的理论,才会从内心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sup>②</sup>“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sup>③</sup>

第三,要重视教育,积极引导。在解决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要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水平,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8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865页。

忌采取空洞的说教和任何强制的方式方法。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群众需要和群众自愿,要把群众需要和群众自愿统一起来,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需要和自愿是文化形态取舍的“两条原则”。一方面,“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另一方面,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是他们在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这时候,“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sup>①</sup>这些话通俗易懂,却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性原则,违反这些原则就必然限于盲动,导致失败,这也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毛泽东曾经以农民对封建迷信的认识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sup>②</sup>这句话十分生动地说明,大众化是自觉自愿的潜移默化过程,要联系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就应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引导群众,反对空洞的政治口号,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方面。

## 第二节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一、认真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挑战和实际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世界总体形势日益呈现出世界政治多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与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多元意识形态思潮的冲击。这些冲击和挑战既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来自国内的;既有来自党外的,也有来自党内的。科学分析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上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挑战。这种挑战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全球化从起源上看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全球化浪潮促进了不同文化思潮的传播与交流,同时也使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与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加紧对其他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渗透。西方国家把经济、政治、文化合为一体,在输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利用电影、网络、餐饮、娱乐等媒介渗透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信念。于是,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我国开始传播、甚至流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国际敌对势力的攻击、谩骂和诋毁。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扬言要在 21 世纪用西方意识形态“重塑世界”,号召“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建立起一个以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势力继续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分化”、“西化”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兜售传播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才能坚持和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抵御西方势力的阴谋。

其次,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社会经济结构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新的挑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之时,使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结构。具体体现在: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结构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人们的一切合法收入,不管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都能得到法律保护。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又促使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加上社会分配领域不公情况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些多样化、多元化和社会收入贫富差距又进一步促使了人们形成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甚至导致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仇富心理从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减弱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需要学术界、理论界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再次,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带来了挑战。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各种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人们鉴别判断各种思想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面临严重的挑战和考验。我国网络事业的发展总体是良好的,绝大多数网站内容是健康的,对推动我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从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内容来看,信息庞杂多样,数量浩如烟海,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健康的,也有腐朽的;有科学的,也有迷信的,甚至有黄色的等。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青年、争夺群众,这对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

生许多影响。从互联网信息发布的情况来看,不仅国内的网站在信息发布方面较难监控,而且网络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BBS、OICQ 和网络聊天室等直接发布信息,其监控的难度就更大,至于国外的一些反动的、不健康的网站,由于我们在技术方面还不能完全屏蔽,其发布的不良信息负面影响就更大。从用户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来看,我国网络的低学历层次用户和年轻用户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本来思想易受波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不强;加之网上交往多为匿名在线,自由空间很大,人员成分复杂,因而相互“感染”速度快、负面影响广。上述这些方面对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

首先,马克思主义原本是指导实践的理论,但实际研究中却出现了经院化的倾向。理论工作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名词概念的研究、历史的考证、经典文献的解读,不愿意触及现实,不愿意直面群众关注的热点;动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创造新名词、发掘新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局限于理论工作者的小圈子内,人民大众被边缘化。

其次,宣传普及的内容不够明确。一些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不明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宣传学习流于形式。还有一些部门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作为宣讲内容,而不是向普通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科学发展观、核心价值体系,削弱了群众的积极性。

再次,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宣传教育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就以在高校开设的“两课”为例,“两课”确实走进了教材,走进了课堂,但走进学生的头脑还需要许多工作。这里面既有教育的方式方法问题,当然也有教学内容如何用生动活泼语言文字表述的问题。同时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人数剧增,加上有的高校重专业轻

思想、重实践轻理论等,对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行大班制,少则将近百人,多则二三百人,致使思想政治课达不到预期效果。另外,宣传普及的方式手段过于简单。传统的“灌输”方式成为宣传普及的唯一方式,造成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抵抗情绪。其实,党的很多理论和方针政策,可以采用通俗读本或者电影、电视、网络等形式多渠道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用大众化的语言、简单化的词句、通俗化的表述来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从实践出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彻底摆脱经院化倾向。

### 二、着力加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业队伍建设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领域或学科要发展,这个学科或领域必须能积聚或吸引相关专业人才参与其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工程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作为支撑。队伍专业化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理论水平强、政治觉悟高的专业队伍。这支能够深入一线、深入群众,采取灵活多样的宣讲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联系起来,让群众从内心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主要是缺乏高水平的理论宣传人才,特别是集理论专业知识与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人才。许多理论工作者缺乏实际经验,只做书斋里的学问,对社会现象不甚了解,对群众脉搏把握不准,对理论深意理解不够。国家虽然在很多高校设置了相关的理论专业,但仍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需求。如果没有素质过硬的专业化队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任很难完成。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都需要建设

相对稳定的专业化宣传队伍,特别是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队伍,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普及形式,在争取群众信任中宣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加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建设刻不容缓。从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角度来说,这支队伍应具备下列素质:

首先,政治思想要强、理论水平要高。俗话说,打铁需得自身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功底,有渊博的理论和理论素养。有人认为,大众化不就是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吗?不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又绝不仅仅是宣传,还要有对马克思主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读,从深层次回答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基础,它为后者提供所需要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材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学理,也就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而且,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进展,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宣传。如果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任何宣传似乎都显得很肤浅,当然群众对你的认可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任何轻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和不可取的。

其次,眼睛要朝下,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曾指出:民兵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英雄等。那么,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更需要有眼睛朝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广大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书斋里、学院里、高墙内,他们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甘于寂寞,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应该值得我们肯定。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也有意无意地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相隔离,甚至脱离社会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场社会实践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关

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发展。如何让他们的研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值得思考。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搞学术研究,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搞学术研究的人都去深入群众,投身社会实践。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向现实生产力转换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研学术成果也可以向现实社会实践转化。关键是如何实现转化。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培养科普作家或科普工作者的办法,培养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架起学术科研和人民大众需求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恰恰为我们做这个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第三,要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掌握一定网络知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已经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理论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他们面临技术上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业队伍,除了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外,还要掌握计算机基本理论及网络技术;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又要有一定的科技意识和创新意识;他们不仅要能够准确地表达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责任感。网络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再也不能以传统的说教者形象出现了,而要扮演一个引导者,引导网络使用者利用正确有益的信息。要做好这个角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业队伍就必须努力学习网络知识,提高网络技术水平,熟练掌握网络,能够驾驭网络,学会发挥网络的信息优势和教育功能,帮助网络使用者及时解决遇到的思想文化问题。

加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国家要给予制度上、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从制度层面上来说,要建立相应工作制度给予保障。邓小平曾经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①</sup>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系统工程，它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国家应从制度的高度保障队伍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政策层面来说，要建立相应的政策考核和评价机制。国家要给以政策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进行支持和扶持，对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性奖励，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才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当中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发展。

### 三、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党的十七大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的就在于加强和改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取力和说服力，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大众认知、接受、尊崇和力行的过程，所解决的就是一个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一过程是一个说服和教育的过程，而不是强迫人民大众都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强制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和政府是主导，人民群众是主体。加强党和政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这不能代表党和政府包办一切，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那么，如何处理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党和政府主导和人民群众主体的关系问题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信仰，并把这一点作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并不断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在积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这种教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不能完全按照对党员的严格要求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要求。这其中就是考虑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那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呢？

第一，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天开始，就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作为自己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追寻的目标。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人民性。我们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品质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正是这种理论独特的魅力使人民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主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直至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对于人民群众中一部分先进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对于其中没有加入或成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也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对待他们。

第二，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平等交流心态。一个科学的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相反它更应该走进群众生活当中，化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者，必须以平等的心态和人民群众进行交流，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乐于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句名言实际上揭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文化

水平越来越高,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广,自主意识越来越强。针对这些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者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自觉有机结合起来,更多地采取与人民群众平等讨论的方式,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

第三,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不同的思想。我们知道,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过程,这当中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人民群众的不科学甚至错误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sup>①</sup>这段话也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思想。特别对于各种思想文化激荡的今天,人们或接受或认同或默认了不同的思想,并且形成一定的群体。可以说,对思想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一部分群体的对待问题。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能采取说服、教育、讨论等办法,而不能采取强制、压服的办法,这也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尊重。

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大众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是能够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和反映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可以帮助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思想选择,但绝不能对群众进行强制灌输,更不能代替他们进行思想选择。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意的问题。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 四、注重解决民生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所谓民生，顾名思义就是人民的生存、生活、生计问题，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状况等，它包括民众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死等方面。民生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内容。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赢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信任和支持，赢得民心，就必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问题——民生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从根本上体现在它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包括民生在内的社会生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的同时，注重维护和解决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问题。毛泽东认为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体现在行动上。凡涉及到群众的利益问题，都要落实到每一项具体的政策中，解决好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帮助群众克服每一个具体困难。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坚决克服和避免那种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画饼充饥的现象。早在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如何关心群众生活，如何具体维护群众利益的科学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sup>①</sup>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要通过对群众具体困难的了解,通过办一件件实事、好事,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切实维护他们的利益。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sup>①</sup>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应该就是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这样,毛泽东完美地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解决民生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现阶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更要注意解决民生问题。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程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经济发展取得成就大小以及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利益问题取得成效大小成正相关关系的。如果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太慢,群众利益问题解决不了或者久拖不决,就会降低群众的信任度,不管理论多好,群众也会漠视。同样,虽然国家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但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这也会影响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同时进行。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也伴随着民生问题的凸显,如收入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甚至一部分人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等等。这一方面固然和个人的劳动能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力和知识水平有关系,但不可否认地和我们各种体制上的不健全也有关系。

当前,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观高度,明确部署了改善民生的具体任务。一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努力实现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这需要一方面坚持教育公益性和公平,实现学有所教;另一方面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实现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二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这需要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等等。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需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鲜明地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需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需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进一步强调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六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需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等等。

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一个理论、一种思想是否有说服力,就

在于这种思想和理论能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上述提出的关于解决民生的六大任务,都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增强和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信服和信仰,因而也更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五、努力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思路

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的存在都通过一定的方式存在的,而这种思想或理论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无论语言文字还是传播路径,都要采取灵活多变、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全人类解放事业提供思想指导的理论,这更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的各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化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指导人民进行各种社会实践。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等,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各种形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我们应当在学习和继承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思路。

第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紧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面临的时代任务来进行。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不同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是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特有的时代魅力。上世纪前50年,整个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围绕战争与革命展开的。近代中国,民不聊生,矛盾重重,各种问题相当严重,近代中国的时代特点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寻求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围绕这一任务来进行。新时期，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点。对我们来说，中国正在探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完成这一事业。因此，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紧紧结合这一时代特点和我们的历史任务进行。例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用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祖国统一和外交，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应该把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宣传主要内容展开。这样做使人们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近，因而也使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特点和要求来进行。我们知道，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理论接受得也不多，加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困难，因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也不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民族化。毛泽东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生动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变为更多的人理解和掌握，才有可能把科学理论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确实有利于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也大大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加上文化传播载体特别是信息时代网络传播的普及,以及社会结构多元化和分层多样化,如果现在再仅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民族化,显然就不合时宜。因此,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的特点和要求来进行。例如,对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来说,他们可能更多地以研究为主,事实上研究本身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失去了理论深度;对于青年学生,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他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还可以考虑采取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情况,为他们将来的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指导;对于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可以采取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影视作品、小说等文艺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从而达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特点、具体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第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紧密结合现代媒体传播信息的特点进行。传播媒体或称“传媒”、“媒体”或“媒介”,指传播信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媒体是介于信息和公众之间的桥梁,是中介。现在传播学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都要通过或凭借一定的媒体进行,传播手段的变化决定了文化的样式和形态的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理解和接受,就必须通过一定媒体进行传播,并且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多通过传单、标语、

布告、会议、演讲，或通过一定的文学作品出版和文艺演出，或通过报纸等媒体体现出来，人民群众也就通过这些传播手段逐渐了解、认识乃至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除了传统的传媒手段之外，更要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移动网络等。现代传媒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快，承载的信息量大、受众面广、互动性强等优势。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充分利用形象化的电影、电视、多媒体等多种载体，借助于网络传播学、网络心理学等学科以及计算机网络新技术，拓宽原有的宣传教育阵地，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传播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枯燥的理论生动化，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群众的视野，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从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为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们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应结合新时期新形势的特点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认真借鉴这些历史经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人民大众的生活，化为群众手中尖锐的思想武器，增强人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力、信服力、信仰力，增强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为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 主要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毛泽东文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6、1999年版。
-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88、1989、1990、1991、1992年版。
-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 8.《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版。
- 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11.《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
- 12.《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3.《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12、13、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年版。
- 16.《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4年版。

17.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19. 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20. 李伟：《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21.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2. 庄福龄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23. 何萍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4. 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25. 赵明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6. 涂文学等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7.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28.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 2008 年版。

29. 刘益涛：《中流砥柱——抗战中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30. 叶春主编：《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1. 李琦:《毛泽东与群众路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32. 程伟:《延安整风时期的理论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33. 王炯华:《毛泽东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34.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版。
35. 艾思奇:《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6. 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7. 翟昌民:《回首建国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年版。
38. 何静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39. 刘向信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40. 朱乔森:《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

## 后 记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是我近两年一直关注和思考的课题,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出于爱好和兴趣,出于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敬仰,对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贡献的钦佩;二是在研究中发现,理论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于是就有一种思想冲动,想把自己平时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积累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正在成书的过程中,我申报的一项教育部课题(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10JDJNJD178)审批下来,令我万分高兴。这一喜讯给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使我更加认真、更加严谨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在成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刘志扬教授、姜绍华教授、赵树廷博士、郑小娟博士和葛宁老师、王迎春老师等诸位专家同仁的帮助。他们不仅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启发了我的思想和灵感,而且不断给我精神鼓励和支持。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山东省图书馆白兴勇老师的热情帮助,他给我借阅、复印了大量的资料,没有他的帮助和支持,本书难以顺利完成,在此,向白老师致谢并表示诚挚的敬意!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先生和女儿的理解与支持,先生在本书的整体思路和提纲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女儿自觉学习的态度,自制、独立的良好生活习惯,优异的学习成绩,给我增

添了不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徐翔编辑,在我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她不断地给我关心、鼓励和支持,并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正是他们的热情帮助,使该书得以面世。

由于本人学术水平、认识水平的局限,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敬请广大专家、学者、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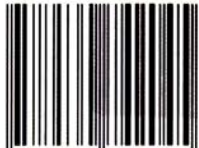
毛玉美

2010年8月8日

# M

责任编辑 姜明  
美术编辑 张荔

ISBN 978-7-5607-4204-5



9 787560 742045 >

定价：19.00元